

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6 | 2

第3卷第2期

总第44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政策导向 202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1
政策导向 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支持高校提前布局、调整优化相关学科专业	3
2025 年度中国教育学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4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5 年学术年会召开	4
国际动态 2025 年美国高校经历裁员潮 至少有 9000 个高等教育岗位流失	5
国际动态 苏格兰独立智库发布报告 呼吁苏格兰高等教育彻底反思和系统改革	7
国际动态 澳大利亚参议院报告呼吁加强大学治理 推动回归教学与研究本位	9
国际动态 希腊清退 30 万名长期未完成学业的“永久学生” 高等教育现代化迈出关键一步	11
国际动态 马来西亚发布高等教育发展规划	12
院校动态 澳门大学：启动重磅改革，五大科技学院 2026 年 8 月正式运行	13
院校动态 首都师范大学：2025 年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取得新进展	14
院校动态 安徽师范大学：揭牌成立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15
院校动态 辽宁师范大学：召开 2025 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会议	16
院校动态 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发布“科教融汇·强基育才”大中小贯通课程体系	19
院校动态 河南师范大学：新入职教师课堂教学准入制度深化实施	20
院校动态 湖州师范学院：拟更名为湖州师范大学	21
院校动态 新疆师范大学：开展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全覆盖调研指导	22
院校动态 黄冈师范学院：“智慧后勤”引发服务效能变革	22

高教研究

24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及其价值取向 刘振天 钟蕊坤	24
加快培养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 杨振斌	38
突破边界：高校学科交叉融合何以可能 卢晓中	42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6年第2期
第3卷第2期·总第44期
2026年1月16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以小同行评价驱动高校学术治理变革 冷辉	57
人工智能 2026 年人工智能如何塑造高等教育的五大预测 凯瑟琳·帕尔默	60
人工智能 数智赋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中“活起来” 万颖	62
“十五五”规划编制 通过规划的大学治理：以首都高校为例 赵玄	65
“十五五”规划编制 海南“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化“职教高考”改革，实现职业教育中高本硕一体贯通	69
“十五五”规划编制 青海“十五五”规划建议：推动有条件的专科院校提升办学层次	70

他山之石

71

从“选育”到“孕育”：中美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与启示 彭婧 陈强	71
高校“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的国际借鉴与本土适配 陈曦明 胡姝 祁瑞敏	72
世界一流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经验与启示——基于 QS 前十高校人工智能指南的比较研究 袁喆 王佳	72
国际顶尖理工类高校本科教育模式比较——基于七所高校的案例分析 黄福涛	73
美国一流高校如何推进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行动与 启示 王维军 段世飞	74
地方高校教育博士培养如何特色化发展——基于美国两类研究型大学比较的视角 王 飞	74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6年第2期
第3卷第2期·总第44期
2026年1月16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2楼
<https://ghc.shnu.edu.cn>

高教动态

政策导向 | 202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新华社记者从 1 月 8 日举行的 202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2026 年，教育部将把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全面推进地方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推动应用型高校主动对接区域重大战略。

围绕合理调整高校布局和数量，教育部将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健全东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机制，加快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一年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新认定 300 多个、已覆盖所有省份；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 1200 万儿童；启动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新增高中学位 149 万个；“双一流”建设高校稳步扩大招生规模，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水平大学。

据悉，2026 年，教育部将持续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更好应对学龄人口变化，完善全国学位监测预警模型，全面开展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改革试点，重点支持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优质普通初高中，扩大资源供给。

另据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报道，202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有六大变化值得关注：

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会议透露，为适应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教育强国的鲜明标志。2015 年“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十四五”正好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期，相关数据显示，“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成效显著，培养全国超过 50% 的硕士、80% 的博士，承担了 90% 以上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任务，涌现出一批“挑大梁”的优秀人才。

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会议强调，将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学生身心健康是千万家庭的共同关切，更承载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期望。“十四五”期间，教育系统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推动五育并举，积极破解“小眼镜”“小胖墩”及心理健康等现实问题。随着健康学校的建设，期待未来教育不仅要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更要助力他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

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

会议透露，将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

随着产业迭代的加快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单一学科难以应对复杂重大的现实问题。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交叉学科”正式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从制度层面打破了学科壁垒。这标志着我国的学科布局进入“交叉突破”的新阶段。有专家认为，此次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旨在以重大科研任务引领人才培养和学科交叉融合，以学科深入交叉融合催生重大基础理论。

加快普及全学段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会议指出，将加快普及全学段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全学段教育”是指将人工智能教育贯穿于各个学习阶段，打破传统教育阶段之间的壁垒，形成一个有机衔接、协同发展的教育体系，利用人工智能自身具备前沿性、开放性、交叉性等特征，更早地识别引导学生、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十分重视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并推出了相关计划。比如，美国的“AI for K-12”计划、欧盟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新加坡的“AI Singapore”项目等，都将人工智能素养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专家指出，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方面，既要坚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又要加强多方协同，为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广泛普及提供重要支撑，同时在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培养的同时，对学生的启智、人格的培养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绝不能放松。

更好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

会议提出，要更好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针对学龄人口变化的排浪式特征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是当前教育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排浪式学龄人口变化指人口出生波动引发的学龄儿童数量周期性高峰与低谷，这种波动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动态挑战，需通过前瞻性规划和灵活机制实现优化。

提升终身学习服务品质

会议提出，要提升终身学习服务品质。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是提高全民素质、提升国家发展能力水平的必然要求。这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想换工作，会有更靠谱的培训帮你掌握新技能；想学新东西，线上线下都有合适的课程可以选择；工作中遇到难题，能找到继续学习提升的途径；哪怕退休了，也能方便地学点新爱好，让生活更有意思……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想学习的时候都有地方学、有东西可学、学得有用。

2026 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些教育新举措将深刻影响每个家庭和每位学子。教育强国建设正在加速，共同期待更优质、更公平、更具活力的中国教育新图景！

（来源：新华网官网、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

政策导向 | 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支持高校提前布局、调整优化相关学科专业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数据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开展人工智能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发布人才需求预测报告，支持高校院所提前布局、调整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好用好北京中关村学院、上海创智学院、深圳河套学院、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等，设置专业课程，培养既懂人工智能又懂制造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工智能认知教育培训，提升全员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加强人工智能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依托国家相关人才工程和项目，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超常规构建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积极引进海

外高端人才。

(来源：教育在线官网)

2025 年度中国教育学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1月11日，2025年度中国教育学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十大热点分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研究、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深化与伦理重构、低生育率下托幼一体化研究、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研究、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研究、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占仁表示，2025年度中国教育学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是回应理论探索与实践关切的具体行动，不仅体现了当代教育学研究者回应时代命题的学术智慧，更彰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破解教育难题的责任担当，希望以此次研讨交流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协同创新，携手探索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想与新路向，共同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些热点既紧扣国家政策导向与教育实践需求，又覆盖理论研究、技术融合、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等多个维度，充分体现了教育学界立足时代、守正创新的学术追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党委书记李红宇表示，自2023年发起“年度中国教育学十大学术热点评选”以来，这一活动已逐步成为汇聚学界智慧、梳理学术脉络、引领研究风向的重要平台。

主旨报告环节，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征与国际方位”等主题作交流发言。发布会上，还举办了青年论坛和期刊论坛，来自各高校和学术期刊的学者进行交流分享。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5 年学术年会召开

1月10日，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暨数字重庆建设与重庆高教创新研讨会举行。会议聚焦“AI赋能高等教育突破跃升，数字重庆建设助推高教发展创新”主题。重庆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李劲渝，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葛道凯，重庆市高等

教育学会会长严欣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高教学会、市教委、市社科联、市民政局、市级教育行业社会组织相关领导及学会会员单位、产业界的代表共300余人参会。

严欣平在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赋能重庆高等教育突破跃升，必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勇于改革创新，深入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治”全链条变革；必须充分认识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加快学科专业布局与高水平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

李劲渝强调，全市高教战线要牢记初心使命，以更高站位服务教育强市建设；要紧盯智能前沿，勇立创新潮头，以更强科技自觉赋能高等教育突破跃升，当好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排头兵”；市高教学会要广泛集智聚力，搭台建桥，凝聚发展合力，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与智力支撑。

葛道凯表示，此次年会主题紧扣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命题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意义重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将持续支持重庆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期待与会各方深入交流，贡献智慧，共同书写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庆篇章。

会议期间，10名市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赋能高教改革新模式、学科专业调整、“双一流”建设、产教融合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大会凝聚共识，协同发力，形成了人工智能发展应用、推动重庆高等教育数字化高质量突破跃升，助力教育强国和教育强市建设的学术成果和智力支持。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际动态 | 2025年美国高校经历裁员潮 至少有9000个高等教育岗位流失

2025年成为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经历剧烈震荡的一年，持续的裁员潮贯穿始终，并在12月以新一轮削减告终。根据《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的追踪统计，全年至少记录了9,000个职位的削减与买断，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许多人事变动未予公开。这一轮结构性调整的深层驱动力，主要源于不断上涨的运营成本与充满不确定性的联邦政策环境。即使在坐拥数十亿美元捐赠基金的顶尖学府，削减举措亦不鲜见，这背后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的多项政策直接相关：其限制联邦研究资金、试图缩减国际学生招生规模以及与多所

大学就所谓民权违规问题发生冲突等行动，共同加剧了高校的财政与管理压力。虽然 12 月的部分裁员行动并非全部可直接归因于特朗普政策，但其整体影响已然渗透至行业生态之中。

以 12 月的具体案例观之，裁员与调整呈现出多样化形态。

其一，国际学生锐减直接冲击高校财政，引发连锁反应。芝加哥的德保罗大学 (DePaul University) 裁减了 114 个行政职位，作为削减 2,740 万美元支出计划的一部分。其国际学生人数相较于前一秋季暴跌近 62%，减少 755 人，校方明确将此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紧缩政策，导致签证获取困难及学生意愿下降，学费收入因此大幅受损。

其二，为应对预算赤字，众多公立院校采取了关闭低入学率学术项目的激进手段。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incoln) 校董会投票决定关闭统计学、地球与大气科学等四个项目，预计裁撤 51 个岗位 (主要为教师)，目标节省近 700 万美元。此举引发了教职员的强烈反对，并对校长罗德尼 · 贝内特 (Rodney Bennett) 发起不信任投票，贝内特随后于 2026 年 1 月初突然宣布辞职。同样，俄克拉荷马州高等教育校董会投票决定在全州系统内取消 41 个学位项目并暂停 21 个，其中旗舰校区俄克拉荷马大学 (University of Oklahoma) 受影响最重，14 个项目被砍，涉及阿拉伯语、汉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及地理学、植物生物学等。新泽西城市大学 (New Jersey City University) 在与基恩大学 (Kean University) 合并前夕，也宣布取消九个学位项目及多个辅修与认证项目。

其三，财务困境直接导致了机构的剧烈收缩甚至关闭。印第安纳州唯一的传统黑人院校马丁大学 (Martin University) 在 12 月中旬解雇了所有员工，并于 12 月 31 日正式宣布关闭。根据此前数据，该校约有 42 名教职员，但其学生规模近年仅维持在 200 人左右。临时校长费利西娅 · 布罗考 (Felicia Brokaw) 对员工坦言，大学已无力支付薪酬。

其四，通过买断计划鼓励资深教职员提前退休，成为众多高校削减人事成本、实现“软着陆”的常见策略。堪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Kansas) 有 34 名终身教职员接受了提前退休激励计划；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为应对 3,000 万美元的预算缺口 (部分源于研究生入学人数不足)，也向符合条件的教职员提供了买断方案；旧金山州立大学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同样推出了早退计划，以期帮助弥补预算赤字，预计将有 60 至 75 名教员参与。其五，社区学院与小规模文理学院亦未能幸免。怀俄明州西部社区学院 (Western Wyoming Community College) 为平衡预算、避免动用储备金，裁撤了 33 个岗位并对另外 30

个进行了重组，其中包含 8 个全职教师职位，且未来可能因州议会考虑进一步削减财产税而面临更多裁员。爱达荷学院（College of Idaho）则进行了学科结构调整，取消了戏剧、传播艺术和哲学三个招生不足的专业，同时新增六个市场需求更高的专业（如生物化学、金融、犯罪学等），在此过程中有 10 名员工（含 5 名教授）被裁。

其他案例亦反映了类似逻辑。田纳西州的克里斯蒂安兄弟大学（Christian Brothers University）裁减了 16 个教师职位，旨在平衡运营预算并为转型做准备。孟菲斯大学（University of Memphis）情境同样置于成本压力之下。

2025 年美国高等教育的裁员潮远非孤立的财务调整，而是由联邦政策突变、国际生源市场萎缩、国内运营成本攀升、部分学科需求变化等多重压力共同触发的行业性结构危机。各院校无论公立私立、规模大小，均被迫通过裁员、项目关闭、合并、买断乃至停办等方式艰难应对，其影响遍及教职员、学术项目多样性及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的稳定性，凸显了在政治与经济环境剧变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深刻挑战与转型阵痛。

（来源：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

国际动态 | 苏格兰独立智库发布报告 呼吁苏格兰高等教育彻底反思和系统改革

2026 年 1 月 8 日，苏格兰独立智库启蒙（Enlighten）发布政策报告《苏格兰大学与学院将何去何从？（Where next for Scottish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该报告由前苏格兰政府社会正义大臣德斯·麦克纳尔蒂（Des McNulty）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荣誉教授胡·莫里斯（Huw Morris）共同撰写。报告深刻剖析了苏格兰高等教育体系所面临的严峻、深层次的财务与结构危机，并强烈呼吁进行一场彻底的根本性变革，而非渐进式修补。

报告指出，苏格兰大学的财务危机并非周期性波动，其根源在于独特的高等教育资助模式已不可持续，乃至面临根本性崩溃。核心问题在于，为苏格兰本地本科生提供免学费教育的政策，并未获得相应水平的公共财政投入作为补偿。这导致生均教学资源持续贬值，苏格兰高等教育机构从苏格兰经费委员会获得的生均教学资助，在剔除通胀因素后，较十年前（2013–14 至 2023–24）实际下降了 19%，且年度资源水平比英格兰同类机构低约 22%。同

时，面向苏格兰本地学生的学费名义支付额已被冻结长达十五年，其实际价值因通胀累积而大幅缩水。

这种结构性资金不足迫使大学高度依赖替代性收入，尤其是国际学生（非欧盟）和来自英国其他地区的学生所支付的高昂学费。2021–22 至 2024–25 年间，苏格兰大学的国际学生学费收入增长了 41%。然而，这种商业模式极不稳定且存在风险。2023–24 年招生季国际硕士生签证数量的骤降曾导致大学面临巨额预期收入缺口，暴露出依赖特定国际市场的脆弱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英国移民政策变化以及来自其他留学目的地的竞争，都是苏格兰大学无法控制的外部风险因素。

更为关键的是，当前的资助模式催生了系统性的扭曲与不公平。一方面，资金上限限制了大学招收苏格兰本地学生的数量，因为招收超额学生只能获得已被冻结的极低名义学费，从而加剧校方的资金缺口。这导致苏格兰学生进入爱丁堡、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等“精英”大学的机会日趋竞争激烈，实际上与免学费政策旨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为弥补教学赤字，大学倾向于扩张成本较低、利润较高的授课型硕士课程（主要由国际学生选修），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其利润来交叉补贴医学、生命科学、工程等成本高昂但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学科教学与研究，这种内部交叉补贴模式本身也十分脆弱。

报告进一步强调，危机在学院表现得更为尖锐。预计 2025–26 学年苏格兰 92% 的学院将处于赤字状态。僵化的资助机制不仅阻碍了学院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发新课程的能力，还因大学在相同课程层级上以更高的生均公共成本“虹吸”潜在的学院申请者，而使学院财务状况雪上加霜。报告还揭露了资源在部门间不公平转移的现象，例如为救助邓迪大学（Dundee University）而可能动用了原本计划用于学院的预算，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进一步损害了学院部门的可持续性与士气。

作者认为，近期苏格兰政府宣布将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苏格兰大学可持续性与成功框架（Framework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uccess of Scotland’s Universities）”，尽管是积极一步，但其审查范围未能涵盖更广泛的中学后教育体系，特别是将大学与学院的资助问题割裂开来讨论，错过了一个促成必要公众辩论的良机。邓迪大学几近崩溃的事件本应成为一个催化剂，引发关于公共资助目标、规模与支付者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入讨论，而非仅仅聚焦于内部管理问题。

总之，报告的核心结论是，当前体系不可持续，零敲碎打的调整无法解决问题。作者呼

吁必须通过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对大学和学院作为一个整体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这不仅涉及资助模式的根本改革（包括重新审视学费政策，如考虑引入毕业生付费机制），更关乎重新定义该体系在促进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满足技能需求方面的核心目标与功能。苏格兰正面临技能危机，要解决它，高等教育部门必须打破壁垒，与地区伙伴及雇主深度合作。报告最后警告，将问题拖延至选举之后只会使危机恶化，政治家与大学自身都必须直面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迫切需要。

（来源：苏格兰独立智库启蒙（Enlighten）官网）

国际动态 | 澳大利亚参议院报告呼吁加强大学治理 推动回归教学与研究本位

2025年12月11日，澳大利亚参议院教育就业立法委员会（Senat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Legislation Committee）发布了备受期待的有关大学治理质量的最终报告。该报告不仅是一份政策文件，更被业界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引发了关于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如何运作、为谁服务以及其公共使命是否因数十年公司化侵蚀的深刻反思。报告基于超过300份意见书和五次公开听证会，明确指出许多澳大利亚大学已偏离其推进公共教育和研究的核心宗旨。治理结构日益趋同于公司董事会，将财务表现、管理控制和高管自主权置于学术质量、透明度和问责制之上，导致了对公共机构信任的削弱。

报告提出了八项范围广泛但重点突出的建议，核心在于恢复教学与研究的首要地位。它呼吁各州和领地政府审查大学设立法规，确保公共教育和研究被明确优先考虑。大学理事会（University Councils）的职责和绩效评估需与此使命紧密挂钩。报告还敦促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TEQSA）加强治理指导、开发课程质量和人员配置的新监督框架，并就学术治理发布期望声明。其他建议包括强制性公开报告临时及不稳定就业情况、每年审查教学质量和人员结构平衡，以及加强对学生利益和机构声誉的监督。

报告内容获得了主要大学团体和利益相关方的欢迎。澳大利亚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卢克·希伊（Luke Sheehy）强调，强有力的治理对于构建信任和透明度至关重要，能将学生、员工和社区置于工作的中心。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首席执行官维姬·汤姆森（Vicki Thomson）表示，报告对大学公共使命和强健透明治理的认可，与八

校联盟长期的倡导高度一致，并强调每一轮改革都必须以其对学生体验和成果的影响来衡量。全国高等教育工会（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全国主席艾莉森·巴恩斯博士（Dr Alison Barnes）称赞该报告是行业的“分水岭”，首次将长期存在的临时工化、工资盗窃和有害职场文化等问题牢固地提上了国家议程，但她同时警告改革效果完全取决于政府是否全面实施建议。

报告深刻揭示了治理失效背后的具体症结。临时工化成为最突出且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证据显示在一些机构中高达60%的本科教学由临时或不稳定的员工承担。许多员工描述了他们在短期合同下工作，保障有限，且对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成果的决策缺乏话语权。学生则感到自己因主要由预算压力而非教育需求驱动的战略决策而被边缘化。报告认为，公司化的治理模式削弱了问责制，并使决策者远离了员工和学生。

此次治理调查也与更广泛的大学资助模式辩论相交织。汤姆森指出，八校联盟认同委员会关于紧急审查和改革资助模式的认定，提到了公共投入下降以及“就业导向毕业生（Job-Ready Graduates）”计划造成的结构性扭曲。她强调，需要可持续的资助框架，使大学能够履行其公共使命，并认为真正的改革需要政府确保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全额资助研究成本、削减使学生和员工资源分散的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并优先废除“就业导向毕业生”计划。

报告承接了委员会2025年早些时候的中期调查结果，后者包括限制副校长薪资、提高咨询支出透明度以及加强高管薪酬披露等提议。这些都反映了政治和公众对公共资助机构中高管超额薪酬和决策不透明的日益关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等机构已成为更广泛治理辩论的焦点，其前副校长吉纳维芙·贝尔教授（Professor Genevieve Bell）于2025年9月辞职，此前围绕重组、裁员和成本削减措施的争议持续数月，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随之启动了合规审查。类似治理紧张局势也出现在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等其他机构。

随着报告提交议会，关注点已转向政府是否会采取行动。各州和领地政府被敦促审查支撑公立大学的立法，而在联邦层面，对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标准的拟议修改将取决于咨询结果和政治意愿。报告为改革提供了明确的蓝图，但其能否成为澳大利亚大学治理回归公共使命、重建信任与问责的起点，最终取决于各级政府的实质性行动与承诺。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

国际动态 | 希腊清退 30 万名长期未完成学业的“永久学生” 高等教育现代化迈出关键一步

2026 年 1 月 2 日，希腊教育部宣布一项重大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从公立大学学籍中清除了约 308,605 名在 2017 年之前入学但长期未完成四年制学位课程的学生。此举旨在终结该国特有的“永久学生（eternal students）”（亦称“永恒学生（perpetual students）”）现象，即学生可因制度允许几乎无限期保留学籍，而无需缴纳本科阶段学费。教育部长索菲亚·扎哈拉基（Sofia Zacharaki）明确表示，学籍非终身有效是欧洲现代大学的普遍准则。

该项改革得到了希腊国内多数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支持，被认为是一项“早该实施”的现代化举措。帕特雷大学（University of Patras）负责战略国际化的副校长迪奥尼西奥斯·曼扎维诺斯（Dionissios Mantzavinos）指出，其所在大学约 34,000 名学生中有 18,000 人被清除，其中部分学生的注册时间可追溯至 15 至 16 年前。他认为，这项政策将改善师生比例，并通过使希腊大学体系更接近欧洲规范来提升其国际地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希腊问题前观察站主任凯文·费瑟斯通（Kevin Featherstone）同样视此政策为迟来的改革，并指出过去数十年间，学生群体的抗议力量是阻碍历届政府推进此类改革的主要因素。他进一步分析，此举可能是希腊政府愿意推行更广泛高等教育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信号，尽管诸如允许设立私立大学等更具争议的议题在政治上仍属敏感。费瑟斯通教授还提到，许多希腊学者选择在英国大学工作，部分原因正是为了逃离国内功能失调的大学系统。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单纯清除在册生能根治问题。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的物理学教授卢卡斯·弗拉霍斯（Loukas Vlahos）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批评。他认为，移除“永久学生”仅是处理了表象，并未触及产生该现象的根源。关键的制度性缺陷包括：允许学生反复参加考试而缺乏结构性学业支持；对先修课程要求的执行力度不足；以及存在不要求学生掌握核心课程即可升级的学习路径。他引用数据指出，仅有约 40% 的学生能在六年内完成四年制课程。因此，弗拉霍斯教授质疑，若不对造成学生学业拖延的根本机制进行改革，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再次出现。

此次学籍清理行动规模空前，影响了近一半的希腊在校大学生人口，标志着一项延续数十年的、旨在支持终身学习和兼顾工作的弹性注册实践的终结。尽管面临少数院系教师的反对，但政策推动者相信，此举将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系统效率，并助力希腊大学与国际接轨。

综合来看，希腊政府的此次行动是旨在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行政干预，短期内显著改变了学籍管理的面貌，但其长期成效将取决于后续是否能够如批评者所呼吁的，对导致学业完成率低下的深层教学与管理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来源：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官网）

国际动态 | 马来西亚发布高等教育发展规划

据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2025年12月17日报道，《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2026—2035（Pelan Pendidikan Tinggi Malaysia 2026—2035）》是马来西亚政府面向未来十年推出的一项覆盖全国、广泛参与、高度包容的高等教育系统性发展规划，旨在通过国家层面的整体设计，引导高等教育在全球变革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与前瞻性发展。

从价值取向看，该规划以“以人为本、人文关怀（berpaksikan kemanusiaan）”为核心发展导向。规划明确提出，科技进步必须与人类价值、道德伦理和学术精神同步推进，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更要塑造具备社会责任感、国家使命感和全球视野的“国家建设者（pembina negara）”，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体现马来西亚多元社会背景下的教育价值追求。

从发展动力看，规划将人工智能确立为推动高等教育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赋能工具。围绕AI，马来西亚将系统推进课程体系与学术项目的重构，加强相关领域的科研与技术创新，着力培养本土高端AI专业人才，并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学习及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深度应用，目标在于实现从“技术使用者”向“技术创造者”的根本转变。

从公平与结构优化角度看，规划高度重视扩大教育机会与构建多元升学路径。通过拓宽大学入学通道、推进高等教育“模块化与拆分式学习（unbundling pendidikan tinggi）”，以及为中六考试（Sijil Tinggi Persekolahan Malaysia）和大学预科课程（Matrikulasi）毕业生提供更多高影响力项目，马来西亚致力于实现“不让任何人才被忽视、不让任何学生被落下”的包容性教育目标。

从能力培养看，规划强调语言能力与全球胜任力的协同提升。一方面，持续强化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和学术语言的地位，并拓展其在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巩固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优势，同时扩大中文、泰米尔文、阿拉伯文及族群语言的教学供给，推动马来语在东盟区域的学术合作与影响力，着力培养适应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的多语言复合型人才。

总体而言，《马来西亚高等发展规划 2026—2035》被定位为一份可持续迭代的“动态文件(living document)”，可根据全球形势与技术演进进行定期审视与调整；在此基础上，马来西亚明确提出将自身打造为东盟高等教育枢纽（ hab pendidikan tinggi ASEAN ）、国际学生首选目的地以及面向未来的研究、创新与科技中心，进一步提升其在区域与国际高等教育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来源：上外全球教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院校动态 | 澳门大学：启动重磅改革，五大科技学院 2026 年 8 月正式运行

澳门大学将改组设立五大科技类学院，未来科技领域学生培养规模将达到 14,500 名。澳大校长宋永华表示，这一举措将显著拓展澳大科技创新的广度与深度，为澳大建设成为国际公认的卓越大学提供有力支撑。五大科技类学院将于 2026 年 8 月 1 日正式运行。

澳大目前设有五个人文社科范畴学院、两个科技范畴学院，科技创新力量亟需强化。经澳大咨询委员会及校内程序论证，获校董会批准后，澳大宣布将正式设立医学院、信息学院、工学院、理学院、设计学院等五大科技类学院。

现有健康科学学院将融入并扩展为医学院，打造集高端医学人才培养、先进医疗服务与创新医学研究于一体的国际一流医学院。除现有的生物医学系、药学系、公共卫生及医药管理学系外，将新增临床医学系、药用食品及营养科学系、口腔医学系，包括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联合开办临床医学等专业课程，办学规模将达 4,000 名学生。

信息学院将依托科技学院组建，在现有电脑及信息科学系基础上，增设计算机科学系、人工智能系、微电子系、机器人系、电子及通信系、金融科技及商业智能系，预计办学规模达 4,000 人，引领人工智能、微电子、金融科技、计算机科学等前沿领域人才培养。

工学院将结合科技学院四个现有学系，并新增材料科学及工程系、能源科学及工程系、化学工程及生物工程系、生物医学工程系。预计学生规模达 4,000 名，将满足澳门及粤港澳

大湾区对新工科人才和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

设立理学院旨在对接国家和澳门特区的重点战略需求，为澳门及国家科技创新提供基础性科学支撑。理学院将设置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学生规模约 1,000 名。

新的设计学院将聚焦人工智能及设计，开设视觉传达设计系、建筑及城市设计系及工业设计系，以培育新型设计人才，提升澳门在设计教育与创意产业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预计学生规模达 1,500 名。

此次学科布局同步推动校区资源优化整合。主校区与合作区校区将实行“一校两区”，“优势互补、相互支撑”，改组设立的医学院、信息学院、工学院、设计学院未来将实行两校区联合办学，且总部均设于合作区校区，强化科技类学院与产业的深度对接，助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参考医学院开展国际化联合办学的模式，澳大将持续推进与世界名校在信息、工学、设计等领域的合作办学，开展国际生源引育、高端科教人才汇聚、国际科技交流平台建设、重要国际会议与学术期刊联合承办等工作。

宋永华指出，澳大大幅强化科技类学科布局，将增强学校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动能，培育集聚高端复合型人才；更紧扣澳门与横琴合作区一体化建设需求，促进科技成果在澳琴两地转化落地，培育发展澳门新质生产力。澳大将把握合作区校区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积极贯彻落实特区政府“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统筹推进国际化高等教育、高质量科技创新、高端人才培养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来源：澳门大学官网）

院校动态 | 首都师范大学：2025 年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取得新进展

2025 年，首都师范大学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全年新增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1 人、国家级领军人才 2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6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省部级人才项目入选成果丰硕，新增北京市高创计划领军人才 2 人、青年拔尖人才 1 人、青年骨干人才 4 人；入选教育部博士后引才专项 2 人，获批北京项目青年人才 3 人。截至目前，学校已汇聚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家级领军人才 29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22 人，拥有北京学者 7 人、青年北京学者 5 人，北京项目青年人才 24 人，高创计划入选者 51 人，

构建起以战略人才为引领、领军人才为中坚、青年骨干为支撑的人才梯队发展格局。

首都师范大学围绕学科建设需求，聚焦“高精尖缺”领域，全年引进各类高水平人才 21 人，占同年教学科研岗新进教师总量三分之一。其中正高级职称 9 人、副高级职称 7 人，包括国家级人才 6 人，成熟型骨干人才比例显著提高，有力强化了优势学科与新兴交叉领域的师资核心力量。在引才渠道拓展方面，学校积极构建海外引才平台，成功举办覆盖文、理、教、艺、工全学科的国际青年学者论坛；全年高效开展 5 批次人才自主认定评审，并将认定范围延伸至人文社科、文化艺术等领域，进一步拓宽引才路径，为师资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官网）

院校动态 | 安徽师范大学：揭牌成立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1月10日，安徽师范大学在花津校区举行安徽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揭牌暨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熊宇杰，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高峰、桑青松、田兴友出席仪式。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一线的专家组成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安徽师范大学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师范专业所在学院主要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参加仪式。仪式由桑青松主持。

熊宇杰代表学校致辞。他指出，成立“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是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科技重要论述的战略举措，是主动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实际行动，也是推动学校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双一流”建设突破的关键布局。希望两个中心广泛汇聚校内外优质资源，产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标志性成果，打造具有安徽师范大学特色的科学教育与认知科学学术品牌，为国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出应有贡献。

田兴友宣读了学校关于成立两个研究中心的正式文件。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与会领导嘉宾为科学教育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揭牌。高峰宣读了两个中心学术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

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专家委员会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郑永和教授，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郭秀艳教授分别致辞。两位教授围绕科学教育与认知科学的前沿动态、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中心发展路径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表示将积极履行学术指导职责，全力支持中心在科研攻关、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仪式结束后，两个研究中心分别组织召开了学术委员会会议与高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科学教育课程创新、认知科学与学习机制融合、教育评价改革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交流。

据悉，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将紧密围绕国家科学教育战略需求，致力于建成在科学教育理论研究、课程开发、师资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高地与创新策源地。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将聚焦国际学术前沿，致力于建设学科交叉、特色鲜明，在脑科学与教育、健康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创新平台。两个研究中心的并列成立与协同建设，旨在构建“ $1+1>2$ ”的融合创新体系，推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与社会服务的融会贯通，促进科学教育、认知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两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学校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探索前沿交叉学科、重塑新时代师范教育发展范式方面，迈出了坚实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官网）

院校动态 | 辽宁师范大学：召开 2025 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会议

1月8日下午，辽宁师范大学2025年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在校礼堂召开。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宏、校长罗文波，校领导徐昭峰、于长河、曹锡顶、刘魁勇、李玉君、宁芳、宫利东出席会议；各职能部门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校教学督导，各学院（学部、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各专业负责人、教研室（系）主任、教学督导员、本科教学秘书、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近500人参会。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宫利东主持会议。

会上，教育学部部长杜岩岩分享了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与成效，并展望

了未来工作；第五届全国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获得者、文学院赵浩含老师作了教学创新经验交流。

校长罗文波作题为《苦练内功强实力，乘势笃行拓新局，奋力开启“十五五”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报告。

罗文波从深耕思政教育、深化审核评估、深耕师范主业、优化专业结构、创新培养模式、推进数字赋能、完善质保体系八个方面，全面回顾了2025年本科教育教学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系统总结了“十四五”期间学校的标志性成果：学校不仅在全国教材建设奖、教学成果奖、“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典型教研成果、一流本科课程、“十四五”规划教材等国家级奖励和项目评选中实现较大突破，更培养出一批优秀学子，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等科创赛事，以及全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等顶级体育赛事中斩获骄人战绩。在此基础上，他还深刻剖析了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本科教育发展的六大核心目标：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师范教育品牌；构建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新高地；推进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强化区域协同与战略支撑作用；锤炼高水平育人师资方阵；厚植辽师大特色质量文化。

围绕上述目标，罗文波对2026年本科教育教学重点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八项重点任务：一是坚持五育并举，优化“大思政”育人体系；二是聚焦强师固本，建设卓越教师培养高地；三是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多元分类育人体系；四是强化“双万”引领，推动专业内涵升级；五是深化数字赋能，塑造智慧教育新形态；六是弘扬教育家精神，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七是突出双创赋能，激活AI创新育人引擎；八是狠抓质量攻坚，夯实全链条质保体系。

罗文波强调，全校上下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将个人职业理想融入学校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强国建设，辽师有为”的使命担当，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昂扬斗志、务实笃行，奋力开创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教育强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辽师力量。

刘宏发表题为《锚定教育强国，勇立数字潮头，奋力谱写“十五五”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总结讲话。刘宏指出，本次全校本科教育教学大会既是对“十四五”育人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锚定“十五五”教育强国目标、回应数字时代浪潮、谋划本科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动员。她充分肯定了“十四五”及2025年，学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在教材、教学成果奖、课程、名师、赛事等领域实现国家级奖项的持续突破，并入选教育部全球教师发展学院的分中心建设单位，获批三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加入“地方师范院校卓越教师培养联盟”等全国性平台。刘宏强调，这些进展令人振奋，这些成果印证了辽师大的竞争力，更源于全体师生凝心聚力和砥砺奋斗。她代表学校党委，向扎根教学一线的全体教职员致以崇高敬意与衷心感谢。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刘宏指出，当前学校处于“两个大局”交汇的关键节点，“十五五”是教育强国建设攻坚期，也是学校教师教育从“跟跑”向“引领”跨越的战略机遇期。作为辽宁省师范教育“排头兵”，学校肩负输送拔尖师资的使命，必须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刘宏深入剖析了三大挑战：一是师范教育格局正发生深刻的系统性重塑，“双一流”高校进入教师教育加剧竞争；二是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渴求迫切，我校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亟需系统性变革；三是数字技术对教育的颠覆性影响。

围绕抢抓机遇，刘宏提出四项举措：**一是提高政治站位，锚定战略方向，构建“大师范”生态新体系**，构建“师范强校、多元兴校”的专业生态。**二是深化改革创新，重构育人体系，培育强国建设新人才**。要创新培养模式、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增设教师教育前沿课程群。**三是抢抓转型机遇，强化数字赋能，抢占未来教育新高地**。要树立“全周期数字化”理念，探索数智化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新范式。**四是拓展国际视野，促进交流互鉴，探索教师教育发展新范式**。要依托全球教师发展学院东北亚分院等平台，深化国际合作与引智，打造国际教师培训品牌，扩大区域影响力。

最后，刘宏号召全体师生以“十五五”规划为指引，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在培养数智时代“四有”好老师、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交出一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让校友自豪、让学生有光明前途的优异答卷！

宫利东在会上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对本科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二要细化落实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推动本科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三要强化督查考核，确保落地见效，以务实作风推动我校本科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本次会议不仅擘画了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宏伟蓝图，更精准锚定了高质量发展的实

践路径。学校将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将战略部署转化为生动的办学实践，全力推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实现系统性重塑与整体性跃升，奋力谱写辽师大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华彩篇章，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辽师智慧”与“辽师力量”。

（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官网）

院校动态 | 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发布“科教融汇·强基育才”大中小贯通课程体系

1月7日，由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主办的“科教融汇·强基育才”大中小贯通课程发布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隆重举行。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王志刚、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孙启高，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冯继康、副校长张茂聪，教育学部部长徐继存、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总校长苗禾鸣、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部主任王福建、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刘海江等出席仪式。基础教育集团直属校校长代表参加活动。

会上，王志刚发表讲话。他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山东建设教育强省的关键一年，此次贯通课程体系的发布恰逢其时。他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在立德树人上彰显更高站位，遵循教育规律，让每个孩子都有发光出彩的机会；二是聚焦育人方式变革，深化教科研结合与人工智能应用，以先进生产力支撑教学创新；三是建强教师队伍，完善大中小学教师协同发展机制；四是加强辐射带动，以开放姿态拓展课程应用场景，让优质成果惠及更多师生。他期待项目能扎实落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冯继康在讲话中指出，贯通课程体系的发布既是我们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战略、服务我省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校与基础教育系统协同育人、共同应对时代变革的务实行动。学校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教师教育与学科研究双重优势，统筹整合优质资源，在多个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持，并将利用好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的独特优势，切实提升项目的示范效应与社会价值。就如何推进体系建设，他提出要求：一是筑牢育人根基，在服务“国之大者”中彰显使命；二是强化协同共进，在构建贯通育人共同体中凝聚合力；三是要推动数智赋能，在塑造教育新形态中走在前列。

苗禾鸣发布大中小贯通课程体系。该体系以“强基—育才—创新”三级课程为架构：强

基课程通过大单元整合与情境化教学夯实学科基础；育才课程依托项目式学习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创新课程联通高校实验室资源，为拔尖学生提供长周期科研实践。课程聚焦两大核心突破：通过教科研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将国家课标、前沿成果转化成教师易操作的教学设计；借助高校科技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有机贯通，把大学实验室、科研方法前置到中小学课堂，实现科技教育从活动式参与到体系化培养的升级。该体系创新开发了数智化平台，将专家智慧、名师经验转化为教师“可操作”的教学支持和学生“可感知”的学习体验。

徐继存从学术视角肯定了该体系对把握课程改革内在逻辑的意义，并表示教育学部将提供持续学术支持，推动课程理念与教学实践紧密衔接，并期待通过深度协同形成可推广的实践成果。

孙启高指出，省教育科学院将围绕标准落实、教研指导与评价改进，与各方形成协同格局，推动成果从“研究结论”走向“课堂效能”，特别是在服务县域高中振兴、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与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共同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此次贯通课程的发布与实施，凸显了政府、教研机构、高校与基础教育实践主体协同发力的新型合作模式。各方一致认为，推进“科教融汇·强基育才”工作的关键，在于将教科研优势切实转化为课堂实效，推动课程框架真正落地生根，在学校发展、课堂提质与师生成长中持续见效，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体系贡献“山师智慧”。

（来源：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官网）

院校动态 | 河南师范大学：新入职教师课堂教学准入制度深化实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进课堂教学规范化建设，把好教师授课“第一关”，1月6日，河南师范大学在田家炳教育书院组织开展了2025—2026学年秋季学期本科课堂教学准入集中督导考核工作。

副校长宋晔到考核现场，细致观摩教师教学展示，并与督导专家、参评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她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要坚守三尺讲台，认真讲好每一堂课，潜心教书育人。围绕新教师队伍建设，她提出三点要求，一要严把入口关，强化教学准入机

制；二要系统培训，构建常态化的支持服务体系；三要持续跟踪，以系统的教学支持机制赋能教师专业发展。

本次集中督导考核采取“书面评审+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教学基本功、教学准备、教学设计、内容把握、方法运用等方面开展综合评价。经过校级教学督导组严格评审，共有 49 位新入职教师通过本次考核。

此次集中督导考核是河南师范大学健全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的关键环节，既为新教师站稳讲台明确了质量标准，也集中体现了学校“办对学生负责、让社会满意的教育”的办学理念。河南师范大学将持续深化新入职教师课堂教学准入制度，为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筑牢师资根基。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官网）

院校动态 | 湖州师范学院：拟更名为湖州师范大学

1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等14所学校，其中，湖州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更名大学。

湖州师范学院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16年的钱塘道第三联合县立师范讲习所，1958年开始高等教育，199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99年原湖州师范专科学校、湖州师范学校和湖州教师进修学院合并成立湖州师范学院，2000年原湖州卫生学校并入湖州师范学院。2012年开始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8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21年独立学院求真学院转设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湖州学院。

学校数学、临床医学、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6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拥有23个硕士点、17个省市重点建设学科。现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17个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获国家教学成果奖11项，省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1项、二等奖21项。主持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4项，主持获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共5项，其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95项。

2025年8月4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公示，根据高校设置有关规定及要求，将湖州师

范学院更名为湖州师范大学向社会公示。

(来源：教育在线官网)

院校动态 | 新疆师范大学：开展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全覆盖调研指导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 2025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自 2025 年 11 月 24 日起，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彤率领教务处相关人员，深入全校 18 个学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覆盖下沉式调研，围绕学校当前招生的 67 个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进行专项指导。各学院党政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及教学骨干代表参加了座谈交流。

调研采取“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重点听取各学院关于培养方案修订进展、校外专家论证意见以及修订过程中的核心难点汇报。教务处工作人员针对各专业新修订的培养方案逐一反馈审核意见，并就如何落实“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逻辑闭环、推动课程设置与专业定位精准对接、贯彻 OBE 教育理念等关键环节，进行了详细指导。结合不同专业特点，调研组还围绕社会需求、学科前沿及学生发展，对课程体系优化、实践教学强化、特色模块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彤对各学院现阶段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强调人才培养方案是本科教育的“根本大法”，必须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彰显办学特色与优势，确保新方案具备科学性、系统性与前瞻性。各学院表示，将认真吸纳调研组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培养方案，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官网)

院校动态 | 黄冈师范学院：“智慧后勤”引发服务效能变革

近日，黄冈师范学院大二学生李子言发现宿舍淋浴水温不稳，他没有找宿管阿姨，而是打开“智慧笑联”服务平台，进入“在线报修”模块，拍照、描述问题、提交具体位置，不到 1 分钟就完成报修。学校智慧后勤数智管理平台收到信息后，系统自动派单，维修师傅接单，15 分钟内便与他取得联系，2 小时内彻底解决问题。整个过程，李子言可以在手机上实

时查看处理进度，还能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李子言赞叹道。

“报修流程复杂、问题反馈慢”曾是困扰诸多高校的后勤服务痛点。在黄冈师范学院，一场以“智慧后勤”引发的服务效能变革，彻底破解了这一难题。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技术与机制双重赋能。

一方面，学校加强智慧后勤硬件建设，新建了后勤数智化管理平台，将报修、咨询、反馈等功能整合其中，并联通学校内网，打开微信即可实现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另一方面，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后勤集团优化处理流程，对热水、直饮水等关键生活服务作出“30分钟响应、3小时现场处理、24小时解决”的硬核承诺，让需求指令得到高效落地。

在黄冈师范学院后勤集团的数智管控中心，数智显示屏上跳动着校园后勤的“生命体征”：宿舍供水温度、供水压力、供应价格、水质检测指标、当日报修处理进度、食品原材料快检结果……所有数据一目了然、动态更新，真正实现“一屏管控、全局可视”。

对管理者而言，数智管控中心是数据驱动的“决策大脑”——通过平台数据分析，优化工作人员布点、调节水电资源配置；对师生而言，它是随叫随到的“服务管家”，让后勤服务变得便捷、智能、高效。

“智慧后勤的落地，让后勤响应从‘模糊管理’到‘精准施策’。大数据显示，学校后勤服务平均响应时间压缩了70%，日常问题24小时解决成为常态。”黄冈师范学院后勤集团负责人自豪地说。

此外，学校还加强“互联网+AI明厨亮灶”工程，打造覆盖全校后厨的“天眼系统”。师生可实时观看后厨操作直播；更智能的是，AI算法能自动识别后厨未戴工帽、未戴口罩、吸烟、玩手机等10余种违规行为，一旦发现异常，立刻发出预警。

据悉，自去年以来，黄冈师范学院正全力加强“智慧后勤”建设，以智“绘”校园，推动后勤焕新。目前，这场以智慧化为引擎的服务变革，不仅提升了2万多名师生的校园生活品质，还推动着高校后勤工作从“保障服务”向“育人体系”转型。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高教研究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及其价值取向 | 刘振天 钟蕊坤

摘要: 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结构多样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但“结构已分、功能未分”“声望单峰、同质竞逐”等形式多样化问题仍然突出，尚未实现实质多样化有效转化。我国高等教育形式多样化具体表现在横纵两个维度，在横向维度呈现明显的外观与结构多样化，在纵向维度亦呈现一定梯度分层。高等教育实质多样化是以多层次、全流程分类为纲，实行按类型的资源精准供给与培养目标制定，以确保高等教育体系分工有秩、协同有效、运转有序，其中包括“系统—省域—类别内部—教育过程”四层次实质多样化体系。为此，建议从目标、结构、评价、观念和体制机制五个维度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促使各类高校“各安其道而卓越”。一是人口分类，先定类型化培养目标与规格，再定招生与流动规则；二是类别画像，以数据与案例构建高校类型学画像与发展图谱；三是评价分道，坚持人机共评、学生为本，构建“应为”与“能为”双层指标体系；四是观念革新，以类型平权取代优劣等级，重塑“多路径成才”的公共叙事；五是主体分工，政府、高校、市场之间形成平衡的制度化协同。

关键词: 高等教育；形式多样化；实质多样化；高校分类改革；教育强国

在迈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多样化”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战略命题。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推出分类改革举措，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到《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再到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1]当前，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层级完备的结构格局。然而，这种“多样化”更多停留于形式层面，具体表现为：类型有分，却未形成使命与功能的真实分化；层次有别，却没有沉淀为培养规格、教学范式与评价体系的内在差异。换言之，目前的分类更多停留在外观与结构的多样性上，多数高校在制度激励和声誉压力下，简单化对标头部研究型大学，出现去技能化和去应用化倾向，原本应支撑经济社会多元发展的分类改革逐渐异化为“单峰竞赛”，不仅削弱了体系互补性与效率，也使

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产生脱节。实际上，新时代高等教育多样化体系的发展需要的是全方位、各赛道的平等与卓越。因而，如何从外观与结构的多样性真正转向“各安其道而卓越”，是新时代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核心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扩张的需要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愈发提升至国家的大政方针。^[2]在这一政策逻辑下，教育逐渐由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中的后置环节，转变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前置条件”，社会发展路径也由“经济—科技—人才—教育”循环，转向“教育—人才—科技—经济”循环。由此，高校必须主动回应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科技成果与高质量服务。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由单一走向多样化是一种随现代国家发展、工业化加速与知识生产方式变革而出现的。但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多样化在不同国家和历史阶段呈现差异化形态。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大学普遍以神学、哲学、法律为核心学科，培养对象局限于社会精英，整体上呈现高度同质化。^[3]19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工业化的加速，德国洪堡模式确立了研究与教学结合的学术传统，美国则发展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文理学院与社区学院多元并存的体系，法国、俄罗斯等则在国家主导下形成专业化高等学校格局。这个时期，大学不再单一追求高深知识，而是逐步形成学术型、职业技能型、应用型等多种类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4]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社会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增长，特罗提出的“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阶段理论揭示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不可逆趋势。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技术学院、职业院校等类型高等教育机构不断涌现，美国形成了研究型大学与社区学院互补的二元体系，德国确立了学术型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并行的“双元制”。进入21世纪，不同国家依旧在制度与文化约束下强化本土特色，呈现出全球趋同与本土多元的平衡与张力。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多样化具有以下三个共性：一是制度嵌入性显著，即分类体系深受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影响；二是功能分化明确，不同类型院校在人才培养、科研产出和社会服务上各司其职，避免了无序竞争；三是体系内部流动性较强，特别是在美国，学生可在不同层级院校（如研究型高校和社区学院）之间自由流动，增强了制度的灵活性与包容性。由此可见，多样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演进既顺应这一世界性趋势，却也具有独特的自身发展逻辑。十九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近代大学的创办，使国立、公立与私立并存，

文理、工科、师范、军校等不同类型院校共同发展，初步呈现多样化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需要，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及其模式，高等教育走向高度集中化和统一化。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校类型看似繁多，实则缺乏功能定位与自主发展，属于行政塑造下的“形式多样化”。今天，从“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到学术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并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努力都在一定程度推动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快速发展。历史发展证明，高等教育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必然趋势，而现实的体制机制却阻碍了多样化进程的实质性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更多依赖行政导向和资源配置惯性，导致高校分类改革更多体现为结构划分，而难以深入到实质性功能分化与内涵建设层面。因此，新时代的高校分类改革必须实现由“形式多样化”向“实质多样化”的转型。唯其如此，分类改革才能超越制度供给的表层逻辑，实现多样化发展的深层逻辑，重新确立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中心地位。

二、高等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动因演变与价值意蕴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改革成效显著，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适应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层级、多类型、多形式的高等教育结构。不过，高校多样化仍“形式有余而实质不足”，形式多样化之下掩盖着实质上的单一化。^[5]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分类发展呈现多样化匮乏的现实样态，攀高求全与尚名逐利成为高校趋同发展的外部表现形式，人才培养模式与专业设置趋同成为高校趋同发展的内部现象表征。^[6]尽管形式多样化是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起点，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高校办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学术型、学科型和知识型的，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普及化仍是单一化、同质化的普及化。

（一）高等教育形式多样化动因与理论阐释

“多样化”并非偶然出现的制度景观，而是一种由自然系统的“差异—适应”逻辑经由社会分工、再到教育体制扩张而持续放大的结构性趋势。“多样化”或“多样性”的研究最早源自自然科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以自然选择解释物种的繁衍与分化，揭示多样性并非源于外在设计，而是个体在环境压力下通过变异、选择与重组所形成的适应性格局，并通过有性繁殖实现延续。这一“由差异而致适应”的底层机理，为社会科学理解分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即制度并不以整齐划一的同构状态实现稳定，相反，差异化正是复杂系统提升生存韧性与创新能力的前提。由此，涂尔干1893年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系统揭示了社

会分化的规律，认为分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社会秩序与稳定的基础。帕森斯则通过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建构了分化理论，将其视为社会系统增强适应能力与运行效率的重要机制。结构功能主义普遍认为，分化是系统为满足多样化需求、提升适应性所采取的一种内在安排。经济学则从竞争—选择—效率的视角论证了多样化的效用，认为在要素约束与偏好异质并存的条件下，组织分化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差别化配置并形成最优的多样性水平，从而将“差异”转化为“效率”。

在教育学领域，这些跨学科的理论视角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提供了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持。特罗提出的“精英—大众—普及”框架，并非狭义的高等教育历史分期，而是基于入学率扩张所引发的功能分层：当毛入学率突破15%时，面向更广人群的大众高等教育部门必然与传统精英教育并存；当这一比例超过约50%时，普及化功能随之叠加。^[7]由此可知，多样化既是规模扩张的伴生变量，更是体系功能从单一走向复合的必然要求。克拉克从高等教育系统层面指出：“在相对分权、低控制的环境中，院校能够围绕使命、对象与方法的差异，自发形成多元轨道，由此释放制度创造力。”^[8]已有研究揭示了“治理—空间—自生”的组织生态逻辑：多样化需要被允许、被容纳，并在有限规制中“长出来”。

（二）高等教育形式多样化表征及价值意蕴

在扩张与治理并行的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首先呈现在外部结构与组织版图之上。一方面，以层次、类型、学科门类、办学形态与区域布局为表征的横向多样性，构成了体系的显性外观；另一方面，以资源占有、科研能力、社会声誉与生源质量为梯度的纵向多样性，塑造了分类体系内的隐性秩序。二者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现实运作中相互嵌合。横向的结构扩展为纵向的等级积累提供了“跑道”，纵向的梯度分化又反过来改变横向单元的行为逻辑与功能取向。

我国高等教育在横向维度呈现明显的外观与结构多样化。从宏观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多样化体系有着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专科）教育的多层次结构，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农林医科院校、工科院校、艺术院校、独立学院到职业院校的多类型学校，公办、民办、中外合作与独立学院的多元化办学形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到艺术体育的多样化学科专业，并在东部、中部、西部、沿海和内陆地区呈现出区域化的数量差异与密度差异，形成门类齐全、层级完备的横向景观，确立了体系的外观多元。^[9]这种横向维度的多样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机会公平与多元路径——以多层次、多类型、多形态的供给拓展

不同地区和群体的进入通道。但是，横向维度的多样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表现出“有类无型”或是“有类同型”特征，稀释了其应承载的平等与结构互补。其一，培养规格的趋同化。当前我国高校虽在类型上呈名义多元，但培养规格普遍向学术型范式收敛，毕业要求与产出成果高度同质化，培养环节采用同一模板（通识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思政课程、实践环节等），实践环节以实训或竞赛替代真实情境。其二，学科生态的趋同化。各类型院校普遍采取优先扩充社会热点与资源高地学科，而对区域产业、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等特色化学科供给不足，弱化了区域服务的成果转化功能。其三，评价模式的趋同化。各类别高校内部管理、绩效分配与教师评价几乎均以论文、课题等为核心维度，淡化了类型差异所要求的不同治理逻辑。横向多样性使得形式多样化成为一种“名录式扩容”，既抬高了系统的同质竞争成本，也削弱了体系的互补效率。

我国高等教育在纵向维度亦呈现一定的梯度分层。一方面，面对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国内外的声誉竞争，各高校组织之间滋生出模仿性压力，不断对标头部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体系与治理模板。另一方面，专业共同体的培训、认证与同行评议构成规范性压力，强固了单一的指标体系。在这些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类型的横向差异难以转化为使命与价值的真实差异，多样化分类变成与排名和地位相关的社会排序，并不断在单一的评价体制下不断被强化。其直接后果，价值取向出现偏移，以排名、帽子为上的单峰追逐，挤压了教育本身的公共性与类型平权；纵向“进位”被误读为全面“对标上行”，引发类别间的盲目追逐与同类院校内部的资源等级化分配。^[10]就类型间而言，各类资源与经费支持、重大平台建设机会与重大课题申报名额等往往集中于少数头部研究型高校，学科评估、高校排名与社会身份标识不断外化为头部高校稳固的形象资本，由此所形成资源、声誉与生源的反馈回路，即优势资源带来更多科研产出和社会贡献，进而巩固社会声誉，进一步吸引优质师资与生源。长此以往梯度差距被持续放大，构成“强者恒强”的纵向秩序。就高校内部而言，当某一高校有一门学科入选高层级建设序列（如“双一流”建设学科）时，高校就会将经费、岗位、招生指标与国际合作名额向该学科集中，企图以一带全。结果是校内资源分配的等级化，其他学科发展、公共性教学投入与基础性人才培养被边缘。由此可见，放任形式多样化中的“纵向分化”会使得上端趋于同质化巩固，中段陷入对标型跟随，下段被迫放弃比较优势；纵向“强”无法转化为系统“合”，功能互补与协同效应随之减弱。这正是由“形式多样化”走向“实质多样化”需优先破解的制度症结。

归根到底，“形式多样化”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扩张与制度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也是

价值选择被简化、异化的高发地带。其深层价值意蕴体现了现阶段高等教育在多样化过程中，存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学术崇拜掩盖类型平权、单一评价吞没多元评价等倾向。若任其发展，横向多样必将滑向“名录式扩容”，纵向分化亦会固化为“单峰竞逐”，最终使得高等教育系统陷入“强者恒强、跟随上行、比较优势丧失”的劣化回路。因此，打破横纵维度的形式多样化，助力高等教育实质性多样化发展，是当前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高等教育实质多样化的本质内涵与价值逻辑转向

当前，高等教育多样化之“形”已具，而多样化之“质”未立。横向的外在分类与层级扩容并未转化为培养规格、方法范式与评价模式的差异化落地；纵向的声誉排名却强化了资源单峰集聚，弱化了类型间专业分工与协同互补。因此，应让外在形式分类转化为使命分化，落实按类办学、按类治理、按类评价，真正做到“各安其道而卓越”，以实现从形式多样化到实质多样化的跃升。

（一）高等教育实质多样化的本质与内涵

所谓实质多样化，并非名目之分，而是以多层级、全流程分类为纲，实行按类型的资源精准供给与培养目标制定，以确保高等教育多样化体系分工有序、协同有效、运转有序。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实质多样化体现在四个互为支撑的层次：系统层面、省域层面、类别内部层面、教育过程层面。上述四个层面不是简单相加，而是遵循着将分类的顶层政策话语落实到个体多样化发展的自上而下的逻辑，这是一个上有标准、下有供给、横向分工、纵深落地的一体化闭环。系统标准为区域决策设定边界与预期，区域层面承担的，是将高校类型与功能进行本土化、任务化的整体研判与布局，类别内部据此落实分工，细化为学校、学院、学科的差异化任务，教育过程多样化再把多样化发展这一政策话语落实到个体层面的差异化学习实践体验。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大学才能在“国家所需”与“个体所成”之间实现真正的同位，让高等教育以多样之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11]

第一，系统层面是指国家在大政方针上颁布和推行的多样化分类。这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门类罗列，而是经过历史沉淀和演变，演化出的兼顾高等教育“功能—任务—产出”的顶层类型结构。同一学科门类在不同办学类型中承担不同功能任务，而同一办学类型可覆盖多门类、服务不同场景。政策脉络上来看，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到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国家不断调整、标定了各时期顶层分类坐标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

了“三型、两向、一差异”的高校分类框架。该框架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逻辑起点，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按照“大类+小类+维度”的思路进行分类。从大类上看，根据目标使命、办学定位、服务面向、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把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三大类；从小类上看，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考虑服务面向和辐射范围，以及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求的不同；从维度上看，分别选择不同的战略支撑点进行描述，突显各类高校的鲜明特征和战略侧重点，明确各类高校的目标方位。国家层面的分类框架为后续的省域布局、类别内部分类与教育过程分类提供边界条件与基准参照，也为今后类别内和类别间的进一步分化、分工与协同提供可遵循的系统框架。

第二，省域层面是指在国家分类坐标系之下，把整体“类型结构”转化为“本土供给”的中观职责。不等于再造一套名目分类，而是将省内学校类型结构与区域发展版图相匹配，因地制宜地提供高等教育供给。换言之，省域层面的多样化，是把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的高校按需嵌入本省（区、市）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城镇体系、公共需求之中，形成一定的功能布局与服务谱系。然而，当前不少省域分类仍停留在“再造一套名目分类”。整体看，我国多数省市自治区普遍在政策文本上强调“支持地方应用型、行业特色高校”，但重分类、轻功能落地。多数地区使用单维或双维清单式划分（如北京、江苏、安徽分三类；吉林、内蒙古、重庆、江西等多地分四类；四川分五类；辽宁、上海、浙江构建横纵矩阵；广西、福建、青海等以“建设目标”分四类），使得省域层面形成名目多样但功能同质。

第三，类别内部层面是指是要构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内部的差异化图谱和治理路径。即使同类高校，亦因历史渊源、地理区位、资源条件、培养模式不同而各具风貌，须实施类型内的分化发展。研究型高校的内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科版图与组织形态方面，或以门类齐全的优势学科与交叉平台支撑原始创新，或以若干优势学科群构筑集群高地；应用型高校的内部分化关键在于厘清不同知识的情境化转换，其核心任务是把原理转化为技术、方案、政策，在对标产业与区域场景的综合实践中同时处理落地约束条件（地域、经济、制度等）与多主体协同（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技能型院校的内部多样则主要侧重岗位适配与能力谱系构建，围绕具体职业与岗位要求，实施操作技能—智力技能—社会技能的整合式培育，形成从入门到高阶的可进阶通道。需要强调的是，三类院校并非静态分隔，而是存在相对动态的功能耦合，即研究型高校提供上游知识与方法的溢出，应用型高校完成中游的场景化转化，技能型高校承担下游的人才供给与标准扩散。即使在同一高校内部也可在“研究—应用—技能”三条功能轨上分轨并存、可逆可达，以实现类型边界内的实质多样化。具

体来说，研究型院校的内部分类结构功能像“倒三角”：顶部主体是将研究抽象为理论和方法论的上游能力，中腰为面向问题的应用的牵引层，将上游成果对接具体场景，底部嵌入少量技能以支撑场景转化与实践训练。技能型院校结构功能更像“正三角”：底部主体是面向岗位的操作性与职业能力，顶端保留少量研究与技术迭代能力以牵引标准升级。应用型院校呈“菱形”：中部主体是面向产业与区域场景的应用能力，上端少量承载单峰学科研究，下端少量承担技能与操作型训练。如此，类型间的“横向不同”才不会带来横向漂移，同类型内部的“纵向梯度”才不会造成高校定位和使命的盲目追赶。

以研究型高校内部多样化为例，若是使用“学科门类宽度”和“知识研究深度”作为二维坐标定位，研究型高校可以细划为全面研究型、部分研究型、局部研究型三个类别。其一，全面研究型高校。在“双一流”总体框架内，这部分高校已经具备覆盖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教育的全面学科布局，并通过交叉研究院、重大平台实现研究范式突破与知识生产外溢，它们兼具多学科交叉覆盖与高水平原创能力，通常形成学科门类全面、研究程度深、研究水平顶尖的稳态结构。例如，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自主设立的科研机构共30个，政治批准建立的科研机构共26个，联合建立的科研机构共4个（含材料、信息、医药健康、海洋工程、环境生态、创新管理等多种系统化平台群），展现了全面研究型高校知识发现、生产和转换的一体化逻辑。其二，部分研究型高校。它们不具有完备的全口径一流学科结构，而是在若干学科领域形成集群式高地，由此承担行业、区域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协同研发与人才供给，展现出“关键学科群带动相关重大平台建设”这一中高学科深度融合形态。^[12]这类院校通常不追求全口径的一流学科覆盖，多分布于部分综合实力较弱的“985工程”高校与相当比例的“211工程”高校。需要强调的是，部分研究型是一种功能定位而非行政帽子：是否为“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只具有统计分布意义，并不是分类、资源配置与评价的依据；其判断应回归门类宽度、研究深度、知识外溢能力及区域服务能力等关键数据指标与实际贡献上。其三，局部研究型高校。此类院校主要分布于实力较弱的“211工程”高校与一批省属实力较强高校，整体门类宽度有限而研究深度呈“长尾+尖点”结构，表现为极少数学科或平台达到研究型门槛（如进入ESI前1%或获省部级以上重点平台/团队），这在电力、矿业、交通等行业型学校或地方综合性大学中较为常见。其类型定位不宜简单拉齐为全面研究型，而应坚持“主导类型+嵌入分轨”的校内多类型并存。在保持研究型“尖点学科群”的同时，制度性允许应用型与技能型长期共存，并分别以学院—平台—产教基地对应“研究—应用—技能”三条功能轨，防止“一把尺子量到底”和“强点牵引全校研究型

化”的定位漂移，在类型边界内实现内部多样化与比较优势最大化。对三类高校形态的治理不在于排位，而在于让其各安其位：全面研究型高校应作为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核心枢纽与前沿引领；部分研究型应做强学科群、发挥强势领域外溢优势；局部研究型则宜以分层分类的评估和管理结构来防止“一峰牵引全校”的定位偏移。

第四，教育过程层面的实质多样化。首先，需要把“教育过程多样化”从日常的教学方法中抽离出来。这里的“过程”并非指课堂上是否采用翻转课堂、项目化教学等“形式之变”，而是育人机制如何因类型而异和因人而异。我国长期的“三中心（教师、书本、课堂）”实质上是一种知识中心结构，课程、管理与评价围绕科目数量与应试成绩来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主体性与创新潜能。因此，从高校运行的全过程出发，在多样化语境下要依次回答五个根本问题——“教什么知识”“培养什么人”“谁来培养人”“如何组织管理”“如何反馈评价”，使育人各环节因类型而异、因人而异，把“分类”这一政策话语转变为面向个体发展的个性化方案，让每个学生都有出彩的路径与场域。[13]

其一，从知识生产与创新视角回答“教什么知识”。在现代大学情境中，教育过程的同质化无法同时满足知识生产的多形态与社会任务的多元性，大学生产的不仅是发现性知识，也包括教养性、职业性、批判性、生活性等方面的知识。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大学应提供与研究有关的知识、与教育有关的知识、与专业训练有关的知识以及与智力探究和批判有关的知识。[14]而不同知识形态天然召唤不同的学习路径。有的以问题发现与方法建构为核心，有的以情境转化与方案被采用为检验，有的以岗位胜任与流程改进为尺度。如果教育过程不进行相应分化，学生就只能被动适配单一范式。长此以往会削弱其社会理解，甚至使“创造性与迁移性”这一新质生产力的底层能力无从生长。换言之，教育过程多样化不是形式摆设，而是知识、学习与个体成长之间实现“同构”的必要条件。

其二，从个体发展视角回答“培养什么人”。个体异质性和职业世界的多样化结构使得教育过程不可能再以单一模板应对万千差异。个体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校为不同能力禀赋与性向的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学习路径与成长支持。所谓分类，在此并不是标签与层级，而是围绕个体兴趣、能力、职业规划进行差异化培养，既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又能兼顾人的主体性发展，做到因材施教、人尽其才。

其三，从多元主体的视角回答“谁来培养人”。一是新技术视角的教学主体多样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不应被简单视为“工具附庸”，而应作为重要主体纳入“共教—

共学一共建”的教学共同体中。二是师资结构多样化。应构建理论教师、实践导师、企业导师、行业专家等的多元师资结构，为学生提供的个性化的教师支持体系。在这两条主线的耦合下，“谁来培养人”由传统教师的单一供给转为人机协作与多元师资协同的培养供给。

其四，从教育管理视角回答“如何组织管理”。教育过程多样化之所以成立，不仅因为能够彰显学生的学习权、选择权与参与权，更因为它把选择交还给学生，推动各类高校的治理范式从以管控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以同一节奏、同一方法、同一评价去管理所有学生个体看似公平，实则是对机会的不平等配置。与普通学生相比。拥有隐性文化资本的学生更容易在统一范式中脱颖而出、教育治理过程多样化有利于保障每个学生在自身的最佳轨道上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出彩”不再是修辞口号，真正成为可验证的教育承诺。

其五，从教育评价视角回答“如何反馈评价”。若不承认教育过程的差异性，任何分类都会在单一评价的牵引下重新滑向同构竞争，如研究型被“唯论文”绑架，应用型被“准研究化”拉扯，技能型被窄化为操作而失去尊严。教育评价作为指挥棒和末端保障，为实质多样化的落地保驾护航。

（二）高等教育实质多样化的价值逻辑转向

在现代大学的知识谱系中，“价值之问”或“意义之问”并非附庸。但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体系的高度专业化与方法论权威的扩张，关于人生目的、价值抉择与公共责任的讨论才逐步被挤压到学科边界之外，即使在人文学科中也是如此。“意义教育”从公共议程退却为个体私域的情感陈述。^[15]结果是，大学在“可证伪的知识”上愈发精细，却在“可理解的生活”上转而失语。这正是形式多样化之所以难以转化为培养多元化高素质人才的深层原因：价值维度被系统性边缘化，知识与人本身发生断裂。

从形式多样化到实质多样化的价值逻辑转向，必须从多样化这一概念的内部逻辑出发，直面并修复这一断裂。我们必须在观念层面承认知识的多形态、学生的多样性与社会任务的多元性，并将各类高校的多样化价值选择与公共责任相匹配，进而让形式、结构的差别沉淀为育人过程与价值追求的真实差异。其一，恢复知识多形态的等价正当性，让各种类型的知识在大学知识版图中享有同等地位。长期以来的价值偏差在于以学术为唯一标准，使应用与技能教育处于次等位置，导致结构与功能脱耦。但实际上应用与技能教育不应只是狭义的劳动与实践技能习得，而应包括智力技能、社会技能以及应用能力的全面发展。其二，重塑学生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在个体层面以多路径、可转轨的机制把形式平等转化为发展公平，让

不同学生在最合适轨道上取得“同等尊严的成就”。同时，高等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也关乎个体人格养成、文化传承与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在这种逻辑下，教育的目标不仅是造就“有用之才”，更是培养完整之人。这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逻辑，正是实质多样化的终极价值所在。^[16] 在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需要回应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需求。其三，重申社会任务多元性指向下的适应性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逻辑。从前沿科技创新到产业技术改造，再到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质多样化的价值指向是把社会任务的多元结构内化为类型分工与培养规格的差异化供给，使之既能回应社会结构的多重诉求，又能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长远动力。其四，确立公共理性与各类高校多样化价值选择并重的价值底座。从分类发展的视角来看，各高校应秉承不同的价值选择。例如，研究型高校强调问题发现与方法建构的学术理性，应用型高校强调情境解答与社会采纳的实践理性，技能型高校强调岗位胜任与流程改进的职业理性，三者共同受公共理性的审视与约束，并在育人目标中纳入人格教养、社会责任与专业伦理的共同底线，使每一类教育既成就个人，也兼顾公共追求。

综上，高等教育实质多样化的价值逻辑可凝练为：以学生中心与主体地位为基本指向，以公共理性与差异化价值选择构成价值底座，以知识多形态的等值共生为纲领，以社会任务多元性下的适应性与可持续为运行原则。如此，分类改革方能由外观之“形”转化为育人之“质”，在国家、社会所需与个体所成之间寻求真正的平衡，高等教育方能在多样化之质中孕育可持续的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四、高等教育从形式多样化到实质多样化的实践路径

高等教育多样化要由“形”入“质”，就需要超越分类本身，提高分类的质量与效率，真正做到以多样化人才培养为核心，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需要我们在目标、结构、评价、观念和体制机制等维度深化改革。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最优，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求平衡，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求协调，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求匹配，进而将类型落地为可执行、可检验、可调整的治理与育人方案。

（一）目标上要对“入口”进行分类，先定类型化培养目标与规格，再定招生与流动规则

“入口”不仅是招生、转专业与转段等管理制度，更首先是培养目标、专业目标、培养规格的类型化前置。各高校应依据校级和学科定位明确学校级培养目标、学院学科专业培养

目标和学生发展目标，并将这些目标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学时、毕业要求等逐一对应，形成“先定目标与规格、再定招生与流动规则”的前置逻辑。在后续的招考和培养环节中，应实行分类招生与可转段培养，在学籍管理上设置可逆、可达的转段与学分互认，允许学生在一定准则内自主选择、跨轨流动，构建以学生为主导的选择架构，以兼顾公平与效率。我国台湾地区的分类招生试验显示，把选择权真正交还给学生，比简单扩招更能提升匹配度与完成率。多元通道既提升匹配效率、降低调整成本，也通过扩大自主选择与过程支持推动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

（二）结构上要对类别进行画像，以数据与案例构建高校的类型学画像与发展图谱

在顶层框架上，依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分类画像图谱。具体来讲，以三类定位为纵轴、以“综合—特色”为横轴，叠加理工农医、人文社科、体育艺术等学科门类的差异化发展要求，形成“类型—方向—门类”三维坐标。坐标之内，明确各高校的办学定位、使命愿景、结构功能、目标任务，把分类发展的政策话语，转化为可落地、可诊断的高校类型学画像与发展图谱。在教学管理维度，以学科专业架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团队匹配、治理体系与教育评价等指标进行类别侧写；在人才培养维度，刻画不同类型高校所追求的学生能力谱系与素质画像。一方面，对校内外数据（学科平台、课程模块、科研与转化、就业质量、行业采纳、区域服务等）进行聚类和回归分析，形成不同的类型标签；另一方面，引入时序建模，以关键事件作为关键时间节点，对同一类别高校进行时间上的纵向分析，并把“是否被行业采纳”“是否进入关键岗位”“是否形成标准操作规范”纳入后验证据形成“画像—治理—再画像”的闭环。同时，要重视画像的灵活性和规范性，类型边界要相对清晰，以便资源分轨与评价分道；但也要避免贴死标签，类别间要有包容性和转换性。例如，应用型高校中应当容纳研究型“尖点”，研究型高校同样需要面向场景的应用与职业教育分轨，技能型高校在技艺高地上也可承担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通过“倒三角—菱形—正三角”的可视化坐标描述，将主导类型与嵌入分轨有机统一，确保不同高校在“类型—方向—门类”三维坐标内各展其长、可进可转、协同增益。

（三）评价要分道，坚持人机共评、学生为本，构建“应为”“能为”双层指标体系

评价是指挥棒，要从“形”入“质”，必须把评价体系从单一学术尺度，升级为多元分类评价体系。首先，三类高校的评价标准应与类型功能同构对齐，并分道设“应为”和“能为”双层指标，匹配学校类型与发展阶段。“应为”指标即价值与使命导向下的应达目标；

“能为”指标即在现实情境与资源约束下的可达水平。双层指标把“应该追求什么”和“在当前资源条件下能做到什么”区分开来，既防拔苗助长，又明晰进位路径。其次，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评价，但坚持人机共评。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算法审计与偏差校正机制；但也要定期由教师、行业专家与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质是复核与情境解读，防止掉入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即当指标变成目标时，该指标将失去反映真实情况的能力。再次，重申学生在评价中的重要地位。各学院应合理构建学生主导的评价体系，充分赋予其参与权、知情权与申诉权，将学生对课程、专业、学院、学校的分层满意度与学习体验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与其他评价指标共同构成上位的质量画像。如此，评价分道才不只是末端记分，而是使评价指标、评价手段和学生选择真正内化为完善的评价体系，而后将评价结果上行回流到省域与国家层面，周期性校准拨款结构。

（四）观念要革新，以类型平权取代优劣等级，重塑“多路径成才”的公共叙事

如果没有社会文化语境的松动，入口分类、资源分轨与评价分道最终只会停留在纸面上。长期以来，应试逻辑塑造了单一路径的成才叙事：高分、学术、名校等被认为是唯一的人生上升扶梯。与之伴随的是对应用型与技能型教育的轻视。要从“形式多样化”走向“实质多样化”，要在观念层面完成去等级化的价值校正。瑞士职业教育把“早认知、早进入、早成长”落到实处。不少技术技能岗位的起薪与职业发展速度并不逊于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这也一定程度上从源头上打破了“高等学校文凭即优越”的刻板印象。据统计，个别国家 15 到 19 岁群体中，有超过一半的青年人选择职业教育路径。^[17] 在我国，产教融合的“订单式”教学制度和现代学徒制度已初步显露出价值观念转向的可能性。一些行业龙头（如高端装备、智能家电、生命健康、智慧建造等）与高职、应用型本科院校共同设计课程、共建实训场景，学生在“做中学、学中优”，打造毕业即上岗、上岗能升迁的职业晋升通道。观念的松绑，说到底，是给每一个学生都出彩的成长予以正当性。只有当社会普遍对研究的卓越、应用的卓越与技能的卓越一视同仁时，资源分轨才不会被声望拉歪，评价分道才不会被排名绑架，学校分工才不会被同质化裹挟。

（五）体制机制上要实现主体分工，政府、高校、市场之间形成平衡的制度化协同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复合型制度场域

在精英化阶段还可以依赖单一的学术型逻辑实现稳定运行，但在普及化阶段，其转型和优化绝非单一主体所能为之。^[18] 高校、市场与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自我形塑、无

形规制与外部引导之间的动态张力。政府侧重计划理性与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分类政策、类型化拨款、分道评价等，以最小必要干预尊重高校的学术决断与内部治理；高校是分类的对象，以学术理性为核心，在内部治理上防止行政权力越界与学术权力失范；市场提供无形的规制力量，以人才流向、产业需求和社会认可为指引，打造类型价值的外部约束。主体间逻辑相互嵌套、制约与支撑，具体体现在政府为高校提供制度边界与资源预期，学校在制度空间中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市场再以需求反馈和薪酬结构检验其成效，并反过来影响政府的政策调整。这样的动态闭环既能矫正形式多样化的虚假繁荣，也能催生实质多样化的内生动力，从而打造不同卓越并行、体系互补共生的高等教育多样化新常态。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 人民日报，2025-01-20（6）.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EB/OL] （2025-03-21） [2025-09-10] .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503/t20250321_1184045.html.
- [3] 王红利.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特点探析[J].教育评论, 2015(6): 156-158.
- [4] 刘振天, 周子怡.高等教育多样化: 从外在结构到过程方法[J].高校教育管理, 2025, 19(5): 33-46.
- [5] 刘振天.迈向2030: 以大学多样化助力和引领新质生产力[J].教育发展研究, 2024, 44(11): 29-32.
- [6] 丁焕霞, 牛利华.多样化视域下高校分类发展的现实阻滞与突破进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 42(3): 33-38.
- [7] TROW M.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EB/OL] [2025-11-12] .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91983.pdf.
- [8] CLARK B 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61-166.
- [9] 马永霞, 葛于壮, 梁晓阳.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价值内涵、实践审视与路径优

化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5 (3): 40-46.

[10] 彭湃, 党宇, 胡静雯, 等. 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成效评价工具初探: 基于学生过程体验的视角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5 (1): 56-65.

[11] 侯冠宇, 张楚, 赵娜. 新质生产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研究 [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3 (5): 55-62.

[12] 侯长林. 职业学科建设: 历程、现状和展望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 140-150.

[13] 刘振天. 让每个学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个体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教育强国建设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4 (3): 5-11, 19.

[14] 德兰迪.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M]. 黄建如,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

[15] 克龙曼. 教育的终结: 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M]. 诸惠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0.

[16] 陈亮, 刘艺璇, 王彦凯. 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互动图景、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J]. 高校教育管理, 2025, 19 (5): 55-70.

[17] DAVE T. Preceding and t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Swiss apprenticeship [EB/OL]. (2014-10-10) [2025-09-22]. <https://www.educationandemployers.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The-Swiss-Apprenticeship-System-Report.pdf>.

[18] 王云清. 乡村振兴视角下地方高校助推绿色发展的可持续策略 [J]. 教育文化论坛, 2024, 16 (4): 45-54.

(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26年1月9日网络首发)

加快培养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 | 杨振斌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明确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 深刻指明了新时

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高校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人才自主培养这一核心使命，系统构建高质量教育教学体系，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立足时代前沿、服务国家战略的人才培养新路径，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现实要求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跟跑”到“并跑”，最终实现“领跑”的重要转折期。作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主阵地、主力军，高校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广视野、更强有力担当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体系。

放眼全球，强国竞争的核心是教育、科技与人才的竞争。回望历史，大国崛起往往以教育的跃升为前提——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崛起的国家，其腾飞前的50至80年，都是教育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工业革命发展进程看，过去500年间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到智能化的四次工业革命，其间世界科学中心、世界人才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五次转移在时空上高度一致。可以说，一部世界强国崛起史就是一部世界教育发展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为我国迈入新世纪的更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中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挑战，如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尚需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体系亟待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仍需突破等，高等教育必须从根本上反思自身定位、重塑发展逻辑，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关键、更核心的作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教育领域，借助人工智能有望实现更精准有效的“因材施教”，让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创造性教学和师生深度互动中。在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科研范式，为提升科研效率、加快创新速度提供关键支撑。尽管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重复性、低复杂度的任务，但它仍无法完全取代人类、代替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高校应当在办学中更深刻地认识、运用和发展人工智能，强调人所具有的躬行感知、共情理解、主动建构等“具身性”，充分激发学生和教师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

深刻认识“育人为本”理念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

育人是一项神圣庄严的事业，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高校的使命在于培养能够引领未来、

塑造未来的人才。

“育人为本”是大学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回顾现代大学 200 余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学科知识从单一发展到分化、专业化，再到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现代大学经历了“专业行会—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创新型大学”的变迁，每次变迁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而展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赋能教育，但不能替代教育塑造；大学可以有多重使命，但人才培养是最根本的使命。

“育人为本”要求教师自觉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育人为本”理念的主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深刻变革教育生态的今天，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精神的塑造者、品格的引领者、成长的设计师，是激发学生内驱力和坚毅精神的关键力量，应坚定教育信仰，引导青年学子去完成那些人工智能所不能实现的“现在难，但对将来有益的事”。

“育人为本”应成为高校办学治校的战略选择和自觉遵循。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迫切需求，高校应坚定不移地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优化育人生态系统。要以更长远的眼光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更精准的机制引导学生发展方向，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深度链接自身禀赋、兴趣与国家需要，做出成就自我、服务社会的人生选择。要激励教师勇担使命，在科技飞跃与价值坚守之间找准时代坐标、筑牢教育根基，培育更多胸怀家国、富有创造力的卓越创新人才。

聚焦核心素养，培育面向未来的领军人才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高校要聚焦创新精神、科学素养、家国情怀、多元文化理解与全球视野等四大核心素养，探索超常规、长链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精神是引领未来的动力。大学真正的价值在于激发与众不同的创造力。创新不是空谈，它必须在跨学科的交汇中生根，在复杂问题的解决中开花，在一次次试错和重构中结出成果。高校既要锤炼学生“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能力，也要系统提升其“从 1 到 N”的转化本领。

科学素养是追求真理的基石。科研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沉潜，也需要“敢为天下先”的胆识。高校要引导学生理解科学精神的本质，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质疑

精神、论证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更要通过大师引领、学术熏陶、实践锤炼，涵养学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坚守真理的品格。

家国情怀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底色。面向未来的人才既要有“究天人之际”的理学深度，也要有“通古今之变”的人文情怀。高校要加强价值引领，引导学生理解个人才智只有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中才能获得磅礴生命力和崇高价值，锻造既有铮铮铁骨、独立思考之精神，又有拳拳之心、家国天下之担当的栋梁之材。

多元文化理解与全球视野是融通天下的时代要求。高校要培养的是“扎根中国、胸怀世界”的卓越人才。要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践行“两个结合”，在文化交汇处找到中国声音和世界语言的连接点，在全球视野中坚守中国立场，在理解世界中传承中国智慧。

探索构建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要以守正创新的姿态，从深化“大思政课”育人体系、完善学科专业布局、塑造育人文化生态等方面综合推进，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深化“大思政课”育人体系建设。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顶天立地的“大人才”为目标，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实现价值认同。要推动“五育”融合发展，推进身心融合、科艺融合与通专融合，增强具身体验与环境互动，提升学生共情能力。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他们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恶。

完善学科专业布局。高校要坚持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超前布局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学科专业，持续优化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协同发展，激发学科活力，提升创新潜能，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积极对接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学科建设，建设了一批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的新型学院，努力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优势，同时与重点企业强强联合，聚焦重点领域、未来产业等建设了一批特区学院和创新平台。

塑造育人文化生态。高校要探索将文化育人融入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让优秀文化浸润大学校园、涵育青年学子。要坚持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及时将实验室和企业中的前沿科技和产业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的优质资

源，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营造思想流动、智慧碰撞、教学相长的育人氛围。要顺应 AI 时代要求，鼓励师生将 AI 作为学习助手和创新伙伴，激发师生主体性和创造力，实现人与科技的共生发展。

（杨振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1月13日第15版）

突破边界：高校学科交叉融合何以可能 | 卢晓中

摘要：学科交叉融合包含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两方面的含义。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原因既有知识生产的规律演变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也有国家战略的需求牵引与政策供给的功能驱动，还有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和行动主体的能动建构。然而，要真正实现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并非易事，在从“学科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范式转换中，突破学科边界限制以真正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必然会经历转换压力和发展挑战。当前面临着学科的“领地”性质与交叉融合理念互斥的本体之困、学科的“链式”构成与科层管理样态失配的秩序之困、学科的“弥散化”潜质与产业转化应用脱嵌的效益之困。为此，高校应以基层学科组织迭代重构知识生产共同体、以学科链式协同弥合制度创新系统、以学科自主发展激活主体赋能机制，形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破局之道。

关键词：高校；学科；边界；学科交叉融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就学科设置调整而言，这里的“牵引”应当包括双重意蕴，也引出了两个问题即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是什么样的学科及其“牵引”出怎样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在许多国家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呈全球性发展的趋势。所谓的学科交叉融合包含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两方面的含义，前者是后者的“基座”，后者是前者的“进阶”。然而，“进阶”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未必就是一种合理化进程。近年来，我国学科交叉和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并已成为国家建制。从“牵引”的双重意蕴出发，还可以追问以下问题：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是不是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结果？怎样的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更能体现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究竟面临哪些困局？要摆脱困局、促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需要

建立和完善哪些体制机制？据此，本文将围绕“牵引”的双重意蕴，探讨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必然的生成逻辑、实然的现实困局和应然的制度变革。

一、学科交叉融合必然的生成逻辑

学科交叉融合指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演变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态势，旨在突破固有的学科边界和制度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结构要素的交流互动与有机融合，进而为知识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新的解答范式。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学科交叉融合既可体现为一种结果状态，又可指涉一种过程手段，即集中表达了静态维度上的目标意义和动态维度上的进程意义。在目标意义上，学科交叉融合着眼于弥合不同学科之间断裂和排斥的分化样态，从而保持知识的统合性和系统性；从进程意义上，不同学科之间通过交叉融合的手段强化整合水平，从而提升问题解决效能并增强理论运用的解释力。实际上，作为一种宏大的时代叙事，学科交叉融合并不是凭空而生的，既是知识生产的规律演变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使然，也受到政策供给的功能驱动和国家战略的需求牵引，还包含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和行动主体的能动建构。因此，本文将从知识—技术、战略—政策、价值—行动三对范畴来探讨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成逻辑。

（一）知识—技术逻辑：知识生产的规律演变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学科是历史发展和知识分化的结果，但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域的学科内涵并不一致。在大学场域，学科主要是指“学术分类”或“科学分支”。其中，科学的学科结构和现代学科概念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产物，且不同学科之间在专业主义与规训制度等因素影响下往往存在明显的边界区分。18世纪，学科发展相对缓慢。进入19世纪，专项资金的支持、更大规模学术形式的劳动专业化进程以及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传入美国后导致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等因素使学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构成的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些学科不断分化并衍生出具有亚学科性质的“研究方向”和“专门领域”，使学科之间的区别逐渐明显，也导致不同学科间越来越孤立。由此可见，现代知识系统的演化呈现由学科综合走向学科分化的特征，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然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学科之间的“孤岛—隔离”状态逐渐转向“整合—跨界”，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实现知识再生产、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和时代趋势。

首先，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角度看，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I到III的发展历程，即从传

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到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再到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理论最早由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吉本斯比较分析了知识生产模式 I 和知识生产模式 II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系统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非线性跃迁过程。知识生产模式 I “主要是学科的、同质的、等级的，它包括思想、方法、价值及体现在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式标准，强调学科的边界划分和实证性”，旨在概括知识生产所必须遵循的认知和社会的规范，从而使这种知识合法化并得以传播。知识生产模式 II 的出现则导致了以下变化：“超越学科界限”的跨学科研究不断增长、新的质量控制形式得以发展并破坏了学科形式的评价、“问责文化（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取代了“科学自主文化（culture of autonomy of science）”、“应用环境”作为研究场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产生地点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后来，以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和坎贝尔（David F. J. Campbell）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知识生产模式 I 和模式 II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发展了知识生产模式 III。知识生产模式 III 是对学科规范的超越，强调无论是在追求学科融合方面，还是在追求以复杂性或解决现实世界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方面，不仅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建立联系，更要实现理论发展与专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尽管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在知识特征、边界状态、动力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同，但都呈现明显的突破学科边界的特征，即二者都指向学科交叉融合。由此可见，作为结构变化的力量和学术发展的动力，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生与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需要指出的是，三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差异性及其迭代发展并不意味着前者被后者所替代，三者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换句话说，跨学科和超学科的存在本身就预设了学科的价值意义及其合法性证成。学科是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而学科互涉又是“在构成学科实践的命名、合理化、理论化等行为中，被界定和确定的”。

其次，当代科技创新较多地发生在学科交叉融合领域，即由学科交叉融合催生。科技创新意味着科学原理的变革突破和颠覆性技术的形成，而这往往建立在不同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相关数据显示，1901—2008 年的 356 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奖项中，共有 185 项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占比达到 51.97%。其中，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在颁奖项数中所占比例由 1901—1920 年的 32.00% 上升至 2001—2008 年的 66.70%。还有研究表明，2000—2020 年的 164 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成果呈现显著的学科交叉融合特征，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过程与知识生产主体两个方面。例如，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是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心理学、

脑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量子信息技术体现了物理学、数学、化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融合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融合，且强调科技创新的关键角色及其驱动功能，而科技创新在本质上正是知识的融合创新和结构重塑。从理论角度看，学科交叉融合意味着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协同整合，以实现理论创新和知识再生。这与科技创新的实质意涵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代科技创新离不开学科交叉融合，同时，能够产生新质生产力的新兴科技产业和突破性创新技术往往以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驱动力。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在科技创新上的引领意义。所谓引领意义，是指学科交叉融合在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更好结合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在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高等教育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并着眼于技术发展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大力发展战略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科研原始创新能力。

（二）战略—政策逻辑：国家战略的需求牵引与政策供给的功能驱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教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必争之地，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教育的战略属性也更加凸显。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最关键的结合点，其改革发展更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正如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在阐述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政治论基础时曾指出的，“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战略需求往往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在大科学时代，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世界强国赢得高素质人才、占据科技制高点的不二选择。例如，英国于2018年成立了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并在促进学科交叉研究方面设立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lobal Challenges Research Fund，GCRF）和战略重点基金（UK Shared Prosperity Fund，SPF），以加强研究与创新能力并确保英国的领先地位。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报告，强调要融合学科边界，建立并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从而保持美国的全球科研领导力。由此可见，国家战略需求是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导向和根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不仅需要关注学科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更要着眼于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

在我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同样为国家战略需求所主导和牵引，且更具紧迫性。教育政策作为“政府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动准则”，对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不同国家，其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受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教育体制等因素的制约而有所差异。在我国，教育政策对教育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导向性、强制性和权威性等主导驱动功能更为明显。虽然我国对学科交叉融合的关注相对较晚，但 21 世纪后，学科交叉和高校交叉学科开始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首先，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将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方向和抓手。为了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学科结构优化，2006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要求“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要突出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2015 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双一流”建设，均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发展交叉学科，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融合。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方向得到进一步强调。其次，交叉学科在学科建设层面完成了制度化确认。2020 年 12 月，“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从制度层面确立了交叉学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事实上，早在 2009 年 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就指出，可以按照学位授予单位在学科目录外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程序设置交叉学科。然而，囿于传统学科评价体系和学科分类管理制度等局限，交叉学科建设一直面临着制度性困境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2022 年 9 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出台，我国共计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 7 个一级学科被确定为交叉学科门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交叉学科的正式设立和制度化过程不断完善，也表明交叉学科组织地位的建立和身份认同的获得，由此极大地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理念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再次，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和整合优化进度不断推进。2023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要求“到 2025 年，优化调整高校 20% 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同时强调以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深化“四新”学科建设并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建设。这表明，当前我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在政策导向上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历史转型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更新，学科交叉融合是体现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更好结合的关键节点，也是作为现代社会轴心机构的大学支撑我国国家发展大局、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三) 价值—行动逻辑：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和行动主体的能动建构

关系主义认为，价值具有满足性，即某一事物对其他事物的有利性或有用性，或者说价值存在于客体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之中。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正是在客体功能和主体需要的关系空间中构建的。这种价值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能为解决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综合化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变革性力量。人类社会在现代性和加速主义等的驱动下，进入一个不稳定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共存的所谓“乌卡（VUCA）”时代，传统的科学范式或学科思维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凸显。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所说：“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分离的、被肢解的、箱格化的，而另一方面现实或问题愈益成为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这意味着，人们在看待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需要有系统整合思维，才有可能透过表象直抵事物的本真。二是学科交叉融合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关键要素。有组织科研是相对于高校无组织科研或自由探索式科研而言的，强调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或依赖“个人灵感”和孤立式的工作，而更加依赖于具有大规模性且有资金、设备、人力等广泛资源的稳定投入与强力支持的科研模式。在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立足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新型科研形态。当今科技创新或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不可能仅依靠个体力量，而是基于一种有组织的、团体性、建制化力量达成的。这决定了以使命性和任务性为导向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必须以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基质，通过优化整合不同资源、协同跨部门和多主体力量以及打造学科交叉型组织等来实现重大既定目标。三是学科交叉融合有助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我国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强调中国特色和学科特性的同时，不能故步自封和保守排外，而需要秉承“融通中外”的思想，赋予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之间可交流、可对话、可融合的可能性；也要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用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来赢得外部世界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交叉融合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的价值在于，通过交叉融合形式，创生哲学社会科学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而追问世界本质的冲动终究会在文理的交汇处找到最深刻的回响。

当前，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我国高校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的重要选择和行动路向。各高校都在大力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和超前布局未来新兴学科，以增强其对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引领力。首先，在“双一流”建设方面，相关数据表明，首轮 41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科建设总体规划中，关于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内容平均覆盖率较高，一流交叉学科群是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还有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进行学科布局调整以推动优势学科集群发展，通过项目引领培育以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依托跨学科平台建设以聚合科技创新资源。由此可见，学科交叉融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重要路径选择。其次，在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方面，教育部公布的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数据显示，共计有 282 所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1 017 个。从交叉融合的数量范围来看，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数量范围为 2 至 6 个，其中涉及 3 个源一级学科的有 528 个，占比为 51.92%；次之是涉及 4 个源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数量为 228 个，占比为 22.42%；涉及 2 个、6 个源一级学科的数量较少。从学科交叉融合类型来看，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知识部类为划分标准，统计发现，共有 7 种不同知识部类之间及同一知识部类内部组成的学科交叉融合类型，其中，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次数最多，共计 538 次，占比为 52.91%；最少的是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共计 14 次，占比为 1.38%（见表 1）。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知识部类之间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次数依次分别是 250 次（24.58%）、84 次（8.26%）、83 次（8.16%）、28 次（2.75%）、20 次（1.97%）。再次，在组织机构方面，众多高校设置了与交叉学科相关的组织机构，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如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工交叉研究院和集成电路学院、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与交叉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数

字人文研究中心，等等。

表1 学科交叉融合类型

学科交叉融合类型	次数	百分比(%)
自然科学—自然科学	538	52.91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250	24.58
自然科学—人文学科	20	1.97
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83	8.16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84	8.26
人文学科—人文学科	14	1.38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28	2.75
总计	1 017	100.00

注：以上数据根据2025年6月30日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少量一级学科涉及不同知识部类（例如，心理学可分属于理学和教育学），此处忽略不计。

二、学科交叉融合实然的现实困局

学科交叉融合并非不同学科的松散结合，更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技术集成，不仅体现了与还原主义的对抗，也是对传统学术组织和知识传播方式更为全面彻底的质疑。但是，专业化力量和封闭性制度已经深深嵌入已有的学科组织模式和科学的研究中，而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不管多么重大和重要，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当代学科的特征，并非总会被现有的支持体系迅速接纳”。因此，在从“学科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范式转换中，突破学科边界限制以真正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也就必然会经历转换压力和发展挑战。

（一）本体之困：学科的“领地”性质与交叉融合理念互斥

“领地（territory）”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多类型的概念。该术语起源于动物行为学领域，意指动物通过攻击和防御等行为以满足生存需求的区域。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人类学，一般指个体在其周围环境中拥有的特定空间，这个空间是个体进行保护和行动的场所。霍尔（Edward T. Hall）在微观文化层面把作用于人际交往行为的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固定特征空间（fixed-feature space），即个人和群体活动的基本组织形态之一，既包括物质表现形式，也包括人类在活动时支配行为的隐藏的、内在化的设计。二是半固定特征空间（semifixed-feature space），是指兼具灵活性与功能一致性从而形成的多样化的空间形

态。三是非正式空间(informal space),是指个体周围的个人空间,具体包括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公共距离(public distance)等四种表现形式。莱曼 (Stanford M. Lyman) 和斯科特 (Marvin B. Scott) 在空间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形式的领地,即公共领地(public territories)、家庭领地(home territories)、互动领地 (interactional territories) 和身体领地 (body territories)。整体而言,“领地”是以边界作为逻辑起点的有限空间,为了区分或排斥不同事物而产生了空间内部和外部以及空间内部的同质化趋势。同时,为防止跨域和入侵,产生了领地意识和领地保护行为。

学科是在人的中介作用下产生的具有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双重属性的空间单元。褊狭的学科分类既限制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相互分割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导致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领域,他们“将现代生活划分为‘科学的与占主导地位的各个方面’,从而忽视了日常生活实践。这使得学科从它正在分析的对象或经验中后撤,并将其学术化,抛弃它认为不相关的东西,保留剩余部分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因此,无论是作为知识形态还是作为组织形态的学科,其领地意义都比较明显,领地保护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大学学科而言,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开始便是学者行会,而行会便具有类似领地的特征。由于行会自行其是,很容易造成某些弊端,如散漫、偏执保守、排斥改革。因此,在 19 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

学科的领地性质对高校学科交叉的理念排斥主要体现在知识形态、组织形态及形成方式上。首先,对作为知识形态的学科而言,不同的学科往往因为不同的认知图式和研究范式而产生学科视野的“镜头效应”,即通过学科视野的“镜头”滤除某些现象以专门聚集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效应体现了不同学科在自己独有领地的工作和生活。不同学科在分享相同的主要时,可能会随着风格或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也可能随分工或观念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不同学科或科学领域由于异质性和可渗透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使得不同学科或科学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或水平也存在不同。其次,从作为组织形态的学科来讲,由学科划分形成的研究所、院系、学部等构成大学的基本组织载体。这些组织形式具有较为严密稳定的结构和明显的组织边界,并在专业主义精神的促使下逐渐形成保守性和排他性的学科组织文化。从组织视角出发,应当反对基于学科和院系而存在的结构大门,因为其导致位于学科边界双边的专业之间距离不断增大。按部门组织学科内容更多是人为造成的割裂性结果,如同

封地一般使得不同学科或科学领域之间“泾渭分明”，而这种基层学术组织架构中条块并存形成的制度壁垒常常导致学科难以交叉融合。再次，从学科交叉的形成方式来看，既有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学科交叉，也有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学科交叉。不论何种形成方式，其核心特征都是知识融合：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学习彼此学科的知识，了解彼此的研究需求，并对研究对象形成多学科的理解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理解共识既可以发生在技术、方法、工具、视角或理论中，也可以是它们之间的某种组合。只有形成理解共识的学科交叉才是有效的。然而，其形成过程往往费时费力。这无疑提高了学者参与学科交叉的风险和成本，导致他们为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而放弃参与。

（二）秩序之困：学科的“链式”构成与科层管理样态失配

学科制度是一种国家建制，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学科制度，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包括学科分类制度和学科审批制度在内的学科制度，由此也就决定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中国特色。一门学科往往需要通过进入学科目录才获得合法性身份确认和竞争性资源授权，这使得学科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属性和功能，而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特点又极易造成学科结构等级秩序的存在。同时，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遵循的学科自身规律常常与学科的管理属性及功能产生价值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以学科自身规律为底层逻辑的学科交叉融合。有学者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但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科层制学术组织系统具有森严的等级性，学术权力集中在组织结构的顶端或中心，从而形成单一的学术决策中心或“中心—边缘”式的学术决策模式。同时，在“单位制”传统的诱致下，行政文化嵌入基层学术组织系统，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模式往往使学术权力弱于行政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组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跨部门、跨学科合作的计划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有学者指出，高校的资源投入往往沿着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院、系等组织纵向传递，并且在难以突破刚性、学科化的学科目录和人事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学科交叉融合过程容易出现组织虚化、趋同化和目标替代等形式化现象。此外，锦标赛式学科建设文化，尤其是管理评估机制加剧了学科的自我封闭。虽然学科评估是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已成为我国学科建设的循证机制，也是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学科发展作出价值判断的途径，对学科建设乃至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保障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是，学科评估作为一种管制工具并非总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相适应的。第五轮教育部高校学科评估采用“一级学科绑定参评”的原则和方法，往往致使学科之间界限分明甚至竞争加剧。同

时，“一级学科评估的问题还容易无形中诱导大学按照评估规则来整合不同学科与归并相关成果，提升所谓优势特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名和地位，而不是按照科学研究规律、国家重大现实需求以及知识生产变革趋势来凝练学科范畴，组织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学科群建设”。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学科之间“链式”关联并构成学科纵横链交叉融合。所谓学科“链式”构成，意指学科之间构成包含或派生关系，并不存在一种上下等级的科层关系，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多向动态互动和学科集群构建。同时，学科之间并非完全是孤立性的存在，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依赖、层层递进、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从隐喻的角度看，学科的“链式”构成就如同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提出的“鱼鳞模式（Fish-Scale Model）”，即各专业领域就像鱼身上的鱼鳞一样相互交叠，通过独特狭窄的重叠模式实现整体的全面性。也好似波尼拉（Michael Polanyi）的学科网络关系设想，即科学被相互交叠的学科呈线形或网络状的关系所覆盖，那种在你情我愿之下建立的联系连接着所有成员。这不仅表明了学科的“链式”构成与互动在实践中呈现不同整合模式与层次，也从侧面反映了交叉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总之，学科管理的科层结构或以等级为特征的科层管理样态与科学发展中学科的“链式”样态并不一致。

（三）效益之困：学科的“弥散化”潜质与产业转化应用脱嵌

学科交叉融合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具有整合多元知识、破解复杂问题的“弥散化”潜质与特性。这种潜质表现为研究方向的前沿性、知识组合的异质性与创新产出的高度不确定性。然而，恰恰是这种驱动重大突破的“弥散化”特性，与产业转化应用所要求的精准性、嵌入性和市场适配性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结构性张力。交叉融合孕育的研创效能难以有效转化为产业实践中的应用效能，最终引致“脱嵌”困局。学科研究与创新成果需要转化以彰显其应用价值，其转化效能取决于成果的质量及其转化的途径。而学科交叉研究创造的成果具有边界模糊、流动性强、方向发散等特征，这也使其成果产业化路径更为复杂。其中，作为科技创新表征的专利是一种重要的成果形式和通向产业应用的途径，但并非所有的专利成果都会被应用或都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我国专利转化率一直不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专利申请总量为1 677 701件，位居世界第一，且显著超过位列第二的美国（598 085件）与第三的日本（300 133件）的专利申请数量之和。但在知识产权收益方面，2023年，我国的知识产权

收益约为 121.7 亿美元,美国约为 1 344.4 亿美元,即美国的知识产权收益约是我国的 11 倍。此外,2023 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仅为 5.3%,而美国高校则长期维持在 50%左右,双方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益上同样差距悬殊。“弥散化”潜质催生的海量中国专利及成果,因无法有效“嵌入”产业生态而产生较大转化落差与价值耗散。究其深层原因,一是研创环节与产业需求间的源头性脱嵌,也就是高校科技成果“供给侧”与新兴产业“需求侧”存在错位。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因缺乏产业需求锚定,未能充分面向产业的真实、复杂需求进行定向选题和协同攻关,导致产生大量“无效供给”或脱离市场痛点的成果。二是学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不够所带来的转化性脱嵌,即便产生高质量交叉成果,也难以被现有产业体系“无缝嵌入”。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需经历“研发—中试—量产”多环节,但目前高校普遍缺乏中试平台和工程化团队,学科知识链、创新研发链与产业应用链之间出现断裂,逐渐形成了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死亡谷(Death Valley)”。

三、学科交叉融合应然的制度变革

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困局形成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张力。同时,不论是学科交叉融合,还是交叉学科,学科终究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和核心概念。学科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所蕴含的基于经验的科学权威性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时经历着祛魅化过程,并暴露出制度性僵化的风险。如果说学科交叉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那么加强这一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势在必行。这也是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一般而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存在两种组织变革方式:一是结构性变革,通过学科组织的底层架构、框架或关系进行根本性调整,创设跨学科组织或学科交叉型组织,即通过组织重构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二是功能性变革,即在保留原有学科组织架构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开放边界、共享资源、动态调整等机制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要想回答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应选择何种变革方式并以什么为切入点的问题,必须先回答学科交叉融合何以发生的问题。这涉及科学的范式变革和学科之间是否有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不同系统之间无法用统一标准直接比较或转换的现象。此外,书中还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循环模式,即范式“格式塔转换”:前范式时期—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新的常规科学。从历时性意义上,学科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单一学科、学科交叉融合,再到现代学科(包括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的转换,在学科的衡量标准、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传统常规学科的衡量标准、研究范式不能简单应用于现代学科。实际上,学科交叉融合遇到的种种质疑,往往在于用传统常规

学科的标准衡量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学科交叉融合。学科的“领地”性质对学科交叉融合的阻碍便是一个例证。从共时性意义上，学科交叉融合同时也表明了学科之间存在某种可通约性，特别是在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下，学科研究范式已在相当程度上可通约了，这使得作为学科的学科交叉融合具有了合理性依据。因此，需要用现代学科的标准去衡量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不仅要从学科制度层面确认其学科身份，而且亟须在科学共同体中确认其学科地位。只有在学科制度层面和科学共同体层面形成共同的确认，才能正式宣告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化过程真正完成。基于以上认识，可以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如何选择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制度变革方式。实际上，任何一种组织制度变革都与组织机构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履行的使命、承担的任务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及其机构的超复杂性，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重构和优化路径同样应纳入高校分类改革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校由于履行的使命、承担的任务及原有的学科基础不同，选择的变革方式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大类型的高校，也存在“类中有类、类中有层”的情形。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两种组织制度变革方式，推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构机制和优化路径。

（一）以基层学科组织迭代重构知识生产共同体

在单一学科主导的传统院系结构下，学科交叉更多是以一种局部偶发的状态存在，学科壁垒与组织边界使得高度融合的交叉性研究难以有效展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要以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为切入点，因为“在一种以基层为主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中，基层革新是一种关键的变革形式”。基层学科组织作为一种小型的单位主体，往往也是学术活动与知识生产的最初场域。以基层学科组织革新与迭代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关键在于以问题为中心打破传统学科组织间的无形藩篱，并呈现一种所谓的“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高校趋势。针对当前学科存在的“领地”性质和过于科层化的学科管理模式，进行高校基层学科组织结构变革，以动态协作网络取代静态学科割据，重构面向复杂性问题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一是变科层制为矩阵式。矩阵式结构的学科组织促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计划和项目的开展，纵向上分布着由学科组织进行管理的各个学科，横向上用项目链接不同学科以共同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在突破科层制组织局限性的基础上建构“无边界组织（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超文本组织（hypertext organization）”和“临时性组织（temporary organization）”，形塑具有包容开放特征的跨学科文化，发展不同科学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贸易区”，推动组织成员依据任务的相关性自由流动，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突破等级性、层级化的管理模式，形成多决策中心的“分布式”执行机构。例如，在一些研究型大学实行的项目

负责人制（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便是以问题解决为旨归的任务责任型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实质上是一个微型知识生产共同体，其构成不是以某单个学科为单位，而是一个跨学科组织。二是变学科领地制为交叉融合式。为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近年来逐渐兴起了南方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西湖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些异军突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与导向，试图打破传统大学的学科边界并以增量改革思维作为方法创设跨学科或超学科组织形态，从而为科研创新和学科融合发展奠定组织基础。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造性地设置了支撑融合学科发展的“枢纽（hub）—学域（thrust）”式学术架构，设立功能、信息、系统、社会四大学术枢纽，每个枢纽包含四个不同的学域，枢纽、学域间突破边界限制并实现互联互通。还有一些传统研究型大学也正在积极变革基层学术组织。例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建了一些学院，这些新建学院不再按照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的传统方式组建，而是依据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趋势进行构建。总之，这些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共同内核是打破传统学科组织的制度性束缚，通过指向复杂问题的共同体公约数重构知识生产关系的底层代码，从而推动跨越组织边界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二）以学科链式协同弥合制度创新系统

学科链的本质是知识体系在演进中形成的动态关联结构，根植于科学发展交叉融合的客观规律，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知识体系的连贯性与创新势能的互嵌性。链式协同不同于科层等級式关联方式，主张多个关联性主体的有序链接与协作，是对科层管理范式的革命性超越。链式协同以平等主体间的动态链接取代等级指令，通过价值递进实现资源、信息和能力的无缝整合，最终在协同共生中构筑更高效的价值创造网络，实现制度性耗散的消解与整体系统效能的跃升。在组织变革中，链式协同将功能性变革与结构性变革以链条式逻辑串联起来，形成递进式、相互支撑的协同效应。具体到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变革，这种链式协同包括学科链自身的关联性协同和学科链与其他相关诸链的关联性协同，并意味着每条链上协同主体的不可或缺。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变革中，链式协同是弥合“秩序之困”的关键路径，通过将传统制度中割裂的功能优化与结构重组进行链条式统合，形成制度创新系统的主动调适。例如，可以通过构建学科群或学科集群的方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其中，学科群是由共同属性或性质的学科组成的学科网络，而学科集群是指不受学科共同性质限制的大范围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合，如文理交叉融合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此外，基于链式协同的交叉学科构成，须突破一级学科为基础的学科建设模式，也就是不拘泥于一级

学科，允许部分高校按领域和方向开展学科建设。从学科结构体系看，所谓“不拘泥于一级学科”，实际上涉及的是向上和向下两个维度。向上维度意味着在跨越一级学科边界的基础上走向学科间交叉融合的一种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关系，而向下维度则意味着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实现一级学科内部的结构重构，即以一级学科的某个二级学科（领域方向）为建设主体，并与所属学科门类下的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链式协同，需要依托学科链与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等其他相关诸链的深度耦合。这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重要方式，不仅要求突破高校学科之间的边界，而且需要跨界打开通向产业和科研等部门的边界。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是学科链驱动多链协同的价值转化器，其中，产教融合能弥合“秩序之困”的科层梗阻，科教融汇能解决转化脱嵌的困局。

（三）以学科自主发展激活主体赋能机制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需要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尤其是高校学科自主发展的权力。应把学科如何交叉融合的自主权交给高校。学科发展自主权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内容，而需求牵引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强调以终端需求为核心驱动力。高校只有拥有了学科设置调整的自主权，才能够对科技发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作出敏锐、迅速、恰当的反应，从而破解“效益之困”的核心症结。事实上，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要“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然而，时至今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层面权力适当下放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大学办学自主权恰当行使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之间尚未形成上下协同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应增强政策供给力度，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学科设置调整自主权，例如，赋予高校“领域定义权”，渐进式地促使学科目录由管理属性向统计功能转变；放权给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校，使其根据任务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导向自主探索设置交叉学科以及单列计划，允许“双一流”建设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自主设置无目录学科并配套非对称资源投入，缩短“技术—市场”距离等。其次，应强化法律保障，确保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和约束效力，明确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主体地位，廓清政府与大学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权力关系和责任边界，既使政府成为有效推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有为政府”，以更好地发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对学科交叉融合的引导作用，使市场需求成为牵引交叉学科设置调整的“有效市场”，又避免政府行政权力僭越

高校学术权力。在廓清高校外部关系的同时，也需处理好高校的内部关系，即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关注和重视学院对于学科发展的主动期待与积极作为。最后，应将适应传统科层式的学科管理属性改变为符合科学规律的学科治理属性，以应对当代学科发展的多元、集成、非线性样态。一方面，要增强学科系统的稳健性，平衡多元主体在学科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学科知识生产评价及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应从脆弱性角度对资源配置、学科发展等进行科学分析，识别和保护学科交叉融合可能出现的关键薄弱环节以确保学科可持续发展。只有经过高校学科自主权实质性落地与赋能机制的系统性激活，才能有效释放学科交叉融合的内生动力，使“弥散化”潜质转化为“嵌入式”动能。

（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教育研究微刊微信公众号）

以小同行评价驱动高校学术治理变革 | 冷辉

当前，高校教师评价机制改革已步入攻坚期。《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在此政策指引下，高校教师以“内行评内行”为核心特质的小同行评价，正从学界共识加速转化为制度化实践。这项改革不仅关乎人才评价的公平公正，更深刻牵动着学术价值观的重塑与创新生态的优化，是破解“五唯”顽疾、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但目前，小同行评价改革仍面临多重现实梗阻及系统协同困境，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关键环节进行精准突破与体系化构建，才能推动改革提质增效。

如何真正实现评价标准的分类与多元

“破五唯”改革中，部分高校出现“新瓶装旧酒”现象，传统量化指标仍是学术评价的“隐形硬通货”，技术突破、专利转化、智库报告、教学成果等多元贡献，因缺乏清晰统一的评价标尺和可操作的认定流程，在职称晋升、绩效评定中处于劣势。破解这一难题，需将分类评价落到实处，构建差异化、可操作的评价标准体系。

一方面，要区分出基础研究型、应用开发型、教学为主型、哲学社科型等不同教师岗位类型，并分别制定《代表性成果评价指引》，明确各类岗位的核心评价维度和权重。例如，基础研究型突出“原创性”与“科学价值”，着重考察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应用开发型聚焦“创新度”与“应用实效”，重点衡量成果转化后的经济社会效益和行业贡献

度；教学为主型将“教学质量”与“育人成效”作为核心指标，纳入课堂教学效果、人才培养质量反馈、教学改革成果等具体内容；哲学社科型则强调“思想性”与“社会贡献”，关注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文化传承中的实际价值。

另一方面，各学科领域须系统收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评价案例，尤其是那些突破传统评价形式、彰显多元贡献的突出成果，汇编形成可参考、可借鉴的“评价范例库”，通过具象化的案例指引，将抽象的评价标准转化为直观的参照依据，帮助评审专家和参评教师建立共同的质量语境与价值标杆，推动评价工作从“数数量”的粗放模式转向“评质量”的精准模式。

如何实现评审专家与参评教师的精准匹配

部分高校的小同行评价仍停留在依据学科目录进行粗放匹配的阶段，“大同行评小方向”的错配现象时有发生。少数评审专家因不熟悉参评教师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技术路线，难以触及研究工作的核心价值，评审意见缺乏专业深度。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依托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构建精准智能的匹配机制和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

一是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为每位学者与评审专家建立涵盖研究方向、代表作、方法论体系、学术合作网络、学术影响力等多维信息的动态“学术画像”，推动评审匹配逻辑从“学科匹配”转向“问题匹配”“方法匹配”。同时，加快推进区域性、全国性的评审专家库共建共享，打破校际壁垒，积极引入高水平国际专家，拓宽评审资源的覆盖面。

二是全面落实能够屏蔽身份的“双向深度匿名”评审制度，切断评审专家与参评教师之间的身份关联，借助区块链技术对评审材料流转进行存证，实现评审全流程可追溯。

三是建立“元评价”机制与反馈回路。由学校学术委员会牵头，对评审意见开展“元评价”，重点评估评审意见的专业性、客观性与建设性，结果反馈给评审专家，并作为其在专家库内信誉评级的重要依据。改革“一票否决”的僵化评审制度，推行“综合评议制”，对存在争议的评审结果，组织跨学科专家开展学术辨析，确保评价结论经得起推敲。建立评审意见保密反馈机制，让教师知晓自身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引导与发展功能。

如何保障评审质量并发挥评价的发展性功能

部分高校的小同行评价存在“走过场”现象。由于缺乏对评审质量的有效监督与回溯机

制，一些评审专家给出的意见笼统空泛、缺乏针对性，难以为教师的学术发展提供实质性指导，评价工作的诊断、激励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此，需构建全链条的质量闭环管理体系，强化评价工作的发展性导向。

一方面，要强化过程监督与质量回溯，在“元评价”机制的基础上，引入量化分析工具，定期对评审意见的集中度、离散度与内容深度进行研判，及时识别异常评审行为。将评审质量与专家的信誉等级、未来受邀评审资格挂钩，建立评审专家退出机制。

另一方面，要突出评价的建设性与发展性，明确要求评审意见必须包含具体的学术判断、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与清晰的发展方向，杜绝“空话套话”。在职称晋升、项目评审等关键环节，设立专门的申诉与学术复议通道，组建复议专家委员会，保障参评教师的合法权益，营造严肃严谨、包容开放的评审文化。将小同行评价深度融入教师职业发展全周期，结合评价结果为教师定制个性化的学术发展规划，提供精准的学术支持与资源倾斜，使评价成为助力学者成长的“灯塔”。

如何推动评价结果与人才发展体系有效联动

部分高校的小同行评价结果与教师的职称晋升、薪酬分配、资源获取等关键环节脱节，导致改革缺乏系统性牵引力，难以形成长效激励机制。要打破这一局面，必须深化“评用融合”改革，构建“评价—激励—发展”协同联动的生态体系。

一是可以将评价结果嵌入核心人事制度，在“预聘—长聘”制、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人事工作中，明确将小同行评价结论作为主要依据之一，与教学业绩、社会服务等维度综合考量。针对从事重大基础研究的学者，探索建立国际小同行评估机制或长周期评价制度，设置3到5年的评价周期，营造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

二是可以推动评价结果与激励资源刚性挂钩，建立“贡献度—资源分配”联动机制，将小同行评价认定的学术贡献度与教师的绩效工资分配、科研启动经费支持、实验室空间配置、研究生招生指标等资源进行直接、透明的关联。对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教师，在资源分配上给予倾斜性的激励政策，实现“真贡献”获得“真回报”，激发教师投身科研、潜心育人的内生动力。

三是可以衔接人才培养与支持系统。将小同行评价中涌现的优秀青年学者，特别是研究方向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潜力股”，优先纳入各类人才支持计划，为其提供包括学术交流、

团队建设、项目申报、导师指导等在内的“一揽子”成长方案。建立青年学者学术成长档案，跟踪评价其发展轨迹，动态调整支持策略，形成“以评价发现人才、以支持成就人才、以人才引领发展”的良性循环，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注入活力。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6年1月14日第6版）

人工智能 | 2026年人工智能如何塑造高等教育的五大预测 | 凯瑟琳·帕尔默

阅读提示：2026年1月5日，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刊发凯瑟琳·帕尔默（Kathryn Palmer）撰写的《2026年人工智能如何塑造高等教育的五大预测（5 Predictions on How AI Will Shape Higher Ed in 2026）》文章，聚焦2026年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对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教学、学习及高校的重塑作用，梳理了该领域自2022年11月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 AI）的ChatGPT主流化后的发展脉络，并呈现了五位专家的预测。

自2022年11月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 AI）的ChatGPT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向主流以来，高等教育界对这项技术的思考与实践已历经深刻演变。从最初的学术诚信恐慌，到逐步接纳与试点，再到2025年科技企业与高校均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例如2月加州州立大学系统（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与微软公司（Microsoft）、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 AI）、谷歌公司（Google）等科技企业达成公私合作关系，致力于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劳动力，8月学习管理系统画布（Canvas）的所属企业与开放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将原生人工智能工具和智能体整合到平台中，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融合不断深入。然而，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也日益浮现。展望2026年，高等教育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将成为核心议题。基于行业专家的分析，未来一年的发展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关键方向展开。

首先，高等教育的人工智能进程将极大程度受外部经济与社会舆论环境影响。高等教育学者兼未来学家布莱恩·亚历山大（Bryan Alexander）指出，人工智能领域若在2026年遭遇重大市场调整或“泡沫破裂”，加之可能出现的重大技术灾难或公众态度急剧转向负面，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热情与投入可能随之降温。反之，若该领域持续稳定发展，校园内的人工智

能努力将继续扩大。这种扩张将因校而异，体现为从单门课程教学到全校性人工智能素养计划等不同层级的课程实施，以及从计算机科学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新媒体研究及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应用。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公众对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相对看法的变化：若社会对人工智能持负面态度，看似更可信的学术界地位或得以提升；反之，若亲人工智能的舆论与对高等教育持续负面的看法结合，可能导致人们转向青睐的技术而令高校入学率和资金进一步下滑。

其次，院校将从试点阶段转向寻求规模化战略并衡量其影响。美国大学与学院商务官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商业情报高级主任林赛·韦特（Lindsay Wayt）认为，高校近年来“负责任的乐观”态度将持续。挑战主要来自变化速度，它加剧了成本、安全、隐私及环境等方面的既有顾虑。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扩展至企业层面，领导者，尤其是商业官员，将更致力于寻找有效方法来衡量和传达人工智能工具与资源的投资回报，确保其支持机构使命、优先事项和学生发展。

第三，高等教育需为可能增长的“人工智能幻灭期”做好准备。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马萨尔家族教育学院（Marsal Family School of Education）临床副教授丽贝卡·M·昆塔纳（Rebecca M. Quintana）预见，随着教育者更严肃地应对人工智能使用的环境与社会成本，以及当前工具仍相对不成熟且快速变化，最初的乐观可能转向幻灭。与此同时，校内对人工智能使用的抵制情绪可能增长。教师可能因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无助于学习而抗拒全盘接纳，创造性地采用语音备忘录、手写作业等方式；学生也可能因过度关注人工智能感到疲劳，或认为其与个人教育目标和伦理立场不符。这一时刻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人们重新关注与课程材料的批判性互动等基础实践，并引发关于教育根本目的的更广泛对话。

第四，教育科技公司和技术领导者将致力于在技术与校园社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连接。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高级主管马克·麦科马克（Mark McCormack）强调，2026年高校的挑战在于平衡快速响应创新与审慎采纳决策。技术领导者的“北极星”是培养连接：赋能整个机构的人员，使其实现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的净效益。这意味着技术领导者需教育用户安全有效地使用工具，并与学术及项目领导者紧密合作，确保学生获得未来所需技能。教师将继续身处采纳前沿，引导自身及学生的使用；而在课堂之外，人工智能有望提升行政效率和决策水平。技术团队必须保持连接，提供以人为主的持续支持。在机构层面，基于共同治理和管理的坚实技术、人工智能与数据基础也至关重要。

最后，院校将努力终结系统碎片化，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跨部门效率与自动化。专注于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学生体验的教育科技初创企业智能校园（Intellicampus）首席执行官乔·亚伯拉罕（Joe Abraham）预测，2026年高校将日益优先解决各类系统（如咨询平台、招生工具、财务资助、账单和学习管理系统数据）相互孤立所造成的复杂性与盲点。目标是寻求统一数据、工作流和洞察的方法，而非替换现有系统。具体而言，关注智能体编排与工作流自动化，以在不增加员工学习与管理负担的前提下，提升速度、协调性和准确性，从而最终实现机构层面的整体影响：更强的学生与教师体验、更简化的运营，以及能证明互联智能系统价值的可衡量成果。

2026年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将进入一个更为复杂和分化的阶段。其发展轨迹不再仅由技术本身驱动，而是将深刻受到宏观经济、社会舆论、内部治理、成本效益衡量以及人文反思等多重力量的交织影响。高校能否成功驾驭这一浪潮，取决于其能否在积极创新与审慎负责之间、在技术整合与人的发展之间、在效率追求与教育本质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来源：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

人工智能 | 数智赋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中“活起来”

| 万颖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深度融入思政课，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育人实践。当前，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过程中，部分课堂面临“表面化”“标签化”困境，如单向度的理论讲授难以唤起青年群体的价值共鸣，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尚未充分转化为具身体验的教学载体等。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沉浸式虚拟现实、大数据分析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深度重构信息的生成、传播与认知模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政课堂中真正“活起来”“化进去”，应以数智技术为创新支点，系统性撬动教学内容、方法、评价与育人生态的整体性变革。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融入”到“融合”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个体素养与单向知识传递，易陷入两种窠臼：一是“物理拼接”，即将传统文化素材作为理论教学的装饰性

例证，难以引发学生的深度认同；二是“技术炫技”，虽运用新媒体形式，但内核仍是传统灌输，互动性不足。破解这些难题，可以通过数据化感知、场景化构建、个性化交互、过程化评价等手段，推动思政课从“知识传输”向“意义建构”的范式转型。

活化内容，促进从静态资源到动态生态的转化。数智技术能够将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历史事件转化为数字资源库，并依据教学主题与学生认知水平，动态生成适配案例、叙事路径与问题链。以“矛盾论”教学为例，系统可自动关联“和而不同”处世智慧、“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等，进而生成古今对照的讨论场景，使抽象原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可感可知。

深化认知，推动从浅层感知到沉浸体验、理性反思的跃升。数智技术可以通过构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场域，让学生以“在场者”身份获得情感共振。同时，数智技术还能记录分析学生在沉浸体验中的行为与反馈数据，引导其从情感体验走向深度反思。

重构关系，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协同对话的智慧伴学。通过智能学伴、协作共创平台等载体，数智技术正在重塑教育场域的关系图谱。学生可以与经过古籍语料训练、具备特定思想特质的“AI 先贤”展开跨时空对话，也能在协作空间中围绕具体项目展开探究；教师则转型为学习生态的设计师、对话进程的引导者与价值共识的启悟者，着重引导学生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深层契合与内在共鸣。

构建“四位一体”的融合育人生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度融入思政课，应突破单纯技术叠加的局限，从育人理念、内容供给、场景架构、交互模式与评价范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塑。

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构建“活态化”与“生成性”的文化资源体系。要建设深度语义关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资源库，开发基于社会热点的动态案例生成系统，利用大模型实时解读时事，并自动关联、生成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思政教学案例。同时，应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译与创新表达，探索将经典典籍中的思想智慧，以符合青年认知特点与审美偏好的短视频、互动叙事、虚拟体验等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与传播效力。

实现场景认知升维，打造“沉浸—反思”循环的实践育人场域。可按照“感知—探究—践行”的认知规律，设计连贯数智教学场景。初级阶段可运用 VR/AR 技术引导学生进行文化体验；中级阶段可引入 MR 和社交模拟技术，创设历史文化情境，引导学生在复杂情境

中运用理论进行分析决策；高级阶段可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开放性研究与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尝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创新方案，实现从“知”到“行”的跨越。

重构对话机制，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反馈循环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等技术，实时分析学生在课堂讨论、在线问答、虚拟体验中的观点与情绪变化，为教师提供精准的学情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借助数智技术推送差异化研学资料、组织匹配度更高的在线研讨小组，并生成个性化的反思问题，将人机协同的优势转化为深度思想交流的功效。

完善评价体系，形成“聚焦过程、关注成长”的综合素养评价。要改变单一的终结性知识考核，利用数智技术实现对学生的形成性、发展性评价。如通过多模态数据分析，构建学生“思政素养数字画像”，动态追踪其在文化理解、价值判断、理论运用等方面的成长曲线，为个性化育人提供科学依据。

在技术赋能中坚守思政教育的育人本质

越拥抱技术，越需要保持清醒的伦理自觉和价值定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深度融入思政课，要深刻认识到数智技术是立德树人的“助推器”，而非价值引领的“替代者”。

坚守价值本位，防范技术僭越。要防止技术逻辑冲淡甚至扭曲价值逻辑。课堂上的虚拟体验、人机对话、数据反馈最终要回归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根本目标上来。

保障数据安全，关注数字伦理。在采集与分析学生学习行为、情感反馈等数据时，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守护学生的数字隐私与人格尊严。要警惕并主动审视算法可能存在的偏见，建立人机协同的审核与纠偏机制。

提升教师素养，强化人文引领。要着力培养教师的技术运用与人文反思能力，鼓励教师投入深度师生对话、个性化思想引导与创造性教学设计中，在信任与启迪的互动中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万颖，湖南中医药大学高级政工师）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1月13日第15版）

“十五五”规划编制 | 通过规划的大学治理：以首都高校为例 | 赵玄

摘要：规划对于当代中国大学治理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首都高校需要准确把握定位，全面分析发展环境，认清“十五五”重要意义，科学确定主要任务目标，集全校之力编制好“十五五”规划。通过实施规划，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将更加完备，内部治理结构将日趋完善，高校依法治理效能日益彰显。

关键词：规划；大学治理；首都高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1]大学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已经成为其五年一周期的必答题。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大学来说，制定并落实好“十五五”规划有着重要的治理意义和价值。本文将结合首都高校特点，分析规划与大学治理的密切关系，从善治的角度阐释如何编制好大学规划以及“十五五”规划对大学治理的期待性影响。

规划与大学治理的关系

规划与大学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自从有了大学规划，大学治理就有了新的载体和可量化的依靠。乔治·凯勒在对美国3,100所大学和学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教育管理转型的问题，其断言：“学校管理的自由放任时代结束了，学校规划的时代已经到来。”^[2]具体而言，规划与大学治理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编制规划是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规划，尤其是综合性五年发展规划，涉及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规划的编制过程无疑是对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性的重要检验。以北京大学为例，在《北京大学章程》中至少有六个条款涉及规划，既从总体上明确“学校依法编制和实施规划，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又在相关治理机构职权中明确对规划的权限。例如：大学党委讨论决定规划重大事项，校长“拟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学术委员会有权对“学校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校务委员会参与审议学校“发展与改革规划”，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学校发展规划”。由此不难看出，一个规划的编制，几乎涉及到大学治理体系的所有重要机构。

第二，实施规划的过程就是大学治理体系运行的过程，也是大学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编制好的规划为大学治理提供了一个目标前提和基础依托，而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实施，就成为大学的固定工作和自觉实践。^[3]规划是面向全校的路线图，学校的每一个职能部门、单位和每一位师生，都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这就需要大学治理围绕规划来开展，让规划涉及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治理中来，明确各自的任务和责任，清楚各自的职责和举措，进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可以说，规划实施得越顺畅，目标实现得越完全，越能表明大学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规划的监测与评估有助于调适和优化大学治理。对规划进行监测与评估，既是规划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规划实施成效的重要手段。谁来实施规划的监测与评估，是大学自组织开展，还是聘请第三方机构；如何开展监测与评估，构建什么样的监测指标体系，评估反馈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如何运用监测与评估结果，并发挥好结果对规划本身及大学治理改进的作用，这些问题都与大学治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通过有效的监测与评估，能够及时发现规划实施中的偏差与困难，为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同时，监测与评估结果的运用，有助于推动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完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大学整体治理水平。

基于“首善”标准的首都高校规划编制

明晰了规划之于大学治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面向“十五五”时期大学的发展规划编制，就需要从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考量，达到一种善治的常态。为此，编制规划需要慎之又慎。下面以首都高校为例加以阐释。需要说明的是，首都高校是指所有驻地首都的大学，既包括北京市属高校，也包括在京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部委属高校。与此同时，善治的标准也相应地升格为“首善”，以与“首善之区”的定位相匹配和适应。

第一，要准确把握首都高校的定位。定位是编制规划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是首都高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实际处于或将要实现的方位。从整体来讲，首都高校不同于其他高校，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因为区域位置不同，更多是基于“首都”这一位置的独特性而定。这要求首都高校必须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展现更开放的格局视野、具备更强大的使命担当。从个体来讲，首都各个高校的定位必然各具特色，断然不可能千校一面，这就需要每所首都高校都要找准本校的使命定位。总而言之，确定首都高校的定位，就是把“首都”的独特性和每一所高校的独特性结合起来。

第二，完整准确全面分析首都高校内外部发展环境。首都高校编制“十五五”规划，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一是要贯彻落实好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目标和要求，特别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确定的任务目标，对照各自高校设置相匹配的目标任务。二是要认清首都在国家中的功能定位，进而明确各个高校在首都的功能定位中可以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具体作用。三是要十分清楚高校自身在硬件软件、教师生源、学科专业等各个方面优势、短板、弱项。这是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的基础所在，这些要素分析得越全面准确，则规划编制得就越科学，越具备可行性。此外，从首都区位和高校出发，国际形势也是必须认真加以分析考虑的重要因素，既要分析把握好国际大形势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变化，也要参照教育发达国家的首都高校的发展策略。

第三，充分认识“十五五”时期对首都高校的重大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4]对于首都来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早已确立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到二〇三五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于首都高校来说，“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要服务支撑引领北京的战略定位和相关目标如期完成。

第四，科学合理确定“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十五五”不是孤立的五年，而是接续“十四五”和开启“十六五”的关键五年。“十六五”末即2035年，是确定的教育强国率先建成之年。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自然要发挥好引领作用。首都高校规划目标的确定，需要顺应首都的相关目标任务，来调适各个高校的目标任务，以确保经过两个五年规划如期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同时，各个高校在确定本校目标任务时，还要结合本校重大时间节点。例如：首都师范大学在本校章程中宣示：“坚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虽然没有明确具体建成时间节点，但鉴于其1954年建校，2034年、2044年和2054年对其来说都具有实现一定目标的意义。如此一来，就需要照应到“十五五”期间应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平。

第五，以有效组织编制高质量规划。编制规划是在高校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结果。编制规划绝不是也不能成为发展规划处或者某一部门的一家之事，因为它关系整个学校一段时期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要建立在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的准确总结归纳之上，要全面分析学校所处的发展阶

段和在首都中的定位，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深入各机关、各院系、各单位，广泛听取教职工、学生、校友和专家的意见建议。在形成规划草案后，需要进一步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经过一定的合理时间，打磨确定提交审议的规划文本。最终的规划要经过学校党委会议的讨论审议并做出决定，向学校和社会公开规划，以便接受监督。

“十五五”规划与大学治理新期待

“十五五”时期是首都高校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参照《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预计“十五五”时期对首都高校来说，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群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高校分类发展的格局更加成熟，高等教育对首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同时，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之相适应，大学治理在“十五五”时期应有以下展望。

第一，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更加完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5]“十五五”时期将成为进一步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时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效运行所必需的各项制度将日臻完善成熟，以大学章程为统领的校内制度体系将更加突出党的领导。

第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日趋完善。随着“十五五”时期大学发展目标的实现，与之相适应或支撑目标发展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然会与时俱进地调整与完善。从大学横向治理权力分支来看，党委作为核心作用机构的地位将进一步彰显，职责将进一步丰富，党委所属部门也将做出相应的调整；校长作为大学法定代表人，其选任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探索，以适应新兴大学的治理；学术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也面临适应性调整。从大学纵向院系构成来看，具有历史传统的系科与新兴交叉的学院可能成为两大独特存在，教学科研院系与管理保障院所的职责边界可能会更加明确。院系层面两个或两个以上院系党组织合一、行政班子保持原样可能会是一种选择。

第三，大学依法治理的效能日益彰显。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时期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30周年，这一重大时间节点必将有助于大学依法治理

的回顾与展望，加之教育法典编纂也日益推进，这些因素都为大学法治创造了外部条件。从大学自身来看，随着大学职能日益丰富，其科研创新、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越来越需要法治的保障，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随着大学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大学依法治理的水平和程度将有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 [1][4]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的说明[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31):19–23.
- [2] 乔治·凯勒. 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M]. 别敦荣, 主译. 北京: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 28.
- [3] 王鹏. 中国大学战略规划的演变与展望——以变迁逻辑与大学治理为视角[J]. 中国高校科技,2021(10):4–9.
- [5]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共产党员,2020(3):6–10.

(作者单位: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来源:《北京教育(高教)》2020年第1期)

“十五五”规划编制 | 海南“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化“职教高考”改革，实现职业教育中高本硕一体贯通

日前，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

其中提到，推动“学全球专业”。构建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主体、辐射全球的教育总体开放新格局，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依托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平台，加快汇聚世界一流教育资源，继续引进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来琼办学，打造海南国际教育示范区。办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国际中心、热区高校联盟等平台。持续擦亮“留学海南”品牌。

启动实施“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集聚国家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积极引进急需高素质专业化技术技能人才，构建开放多元的精准引才体系。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

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统筹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布局调整和学科优化，强化科研机构、园区、企业人才集聚培育功能，进一步贯通顶尖战略人才、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青年人才系统培育链条，打造梯度完备的育才机制。深化人才放权松绑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建立符合新职业（新业态）特点的职称评价标准，健全权责清晰的科学用才机制。完善国际人才引育机制，用好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和相关签证政策，优化境外职业资格认可制度，吸引用好国际人才。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建设人才工作数字化平台，提高人才诉求响应与服务质效，提升全方位人才暖心服务保障水平。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持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快薄弱学校全部摘帽**。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前教育优质普惠，扩大公办普通高中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振兴县域高中，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提升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和办学质效，深化“职教高考”改革，实现职业教育中高本硕一体贯通**，促进产教融合、职普融通，形成同自由贸易港产业体系相匹配、协同有力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在**新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和新增引进境外顶尖高校来琼办学上取得突破**，打造高等教育高地。引导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继续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育工程，**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水平专业化教师队伍。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建设智慧教育岛，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十五五”规划编制 | 青海“十五五”规划建议：推动有条件的专科学院提升办学层次

日前，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

其中提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培育建设“双一流”省级梯队**，建立科技创新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青海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群。强化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平台、

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育功能，加快高等研究院建设，培育拔尖创新人才。深化拓展柔性引才路径，培养引进更多科技领军人才、青年创新人才、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优秀人才交流渠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健全人才服务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供给机制，深化优质资源挖潜扩容，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巩固扩大省内外异地办学办班规模，满足学龄人口梯次达峰教育资源需求。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统筹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实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工程，有序扩大优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推动有条件的专科院校提升办学层次**。实施职业教育能力提升工程，建设特色鲜明的职业院校，**优化中高本贯通培养路径**。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强化教师权益保障。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多元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场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稳妥推进中考改革。优化终身学习教育服务体系。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他山之石

从“选育”到“孕育”：中美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与启示 | 彭婧 陈强

摘要：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落点之一。当前全球竞争本质上是顶尖人才之争，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高质量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基于中美人才实力、学术成果、创新转化等3个维度的比较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基础学科研究人员规模与论文产出总量增长迅速，但人才质量、成果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仍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深入剖析显示，中美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系统性差异：政策导向上，美国呈现由社会需求驱动的演进特征，我国则以国家战略为主导；选拔机制上，美国侧重“综合识才”，我国强调“公平筛

选”；培养体系上，美国模式相对成熟完备，我国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评价方式上，美国注重过程性评价，我国依赖绩点量化；培养链条上，美国与社会系统良性互动，我国体系相对独立。为有效提升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研究提出四大转变：从“选育”到“孕育”的范式转型；从“筛选人才”到“孕育人才”的目标转变；从“单一通道”到“多元指引”的过程转变；从“阶段培养”到“终身成长”的周期转变。在此基础上，围绕选拔模式、培养模式、评价模式提出优化路径。

关键词：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人才培养；中美比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科技自立自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基础研究

（来源：《创新科技》2025年第11期）

高校“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的国际借鉴与本土适配 | 陈曦明 胡姝 祁瑞敏

摘要：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适配、区域就业协调等仍需结构性优化。通过梳理美国 ONET、英国 Careerpilot、德国“职业教育4.0”及日本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经验，提炼出标准化数据库、动态更新、跨主体协同等成熟做法，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本土优化策略：构建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职业信息数据库，建立定期更新与新增机制；打造面向学生的数字化指导系统，整合个性化规划与资源；建立技能需求预测与资源共享机制，强化政行校协同；深化校企合作，以立法与基建升级推动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国际比较；本土优化

（来源：《教育与职业》2025年第22期）

世界一流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经验与启示——基于 QS 前十高校人工智能指南的比较研究 | 袁喆 王佳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对高等教育教学方式、治理结构与伦理规范提出深层挑战。世界一流大学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制度表达与实践路径为我国高校提供了重要参照。以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十高校发布的人工智能使用指南为对象，构建“态度—行动—比较”分析框架，以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系统辨析世界一流大学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议题结

构、价值取向与治理样态。数据分析表明：各高校均遵循“鼓励+限制”的双轨话语表达，议题集中在学术诚信、责任边界与数据保护方面，呈现出“积极激励型”“均衡谨慎型”“议题导向型”三种模式，在不同阶段出现治理样态的动态演化与制度调适。各高校在政策设计上的差异主要受区位政策环境、学科优势及使命职能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是以价值为引领，构建伦理嵌入的治理体系；二是以禀赋为调适，推动差异化治理路径建构；三是以能力为核心，夯实制度运行的支撑基础。最终实现治理范式由“规则制定—行为控制”向“价值引领—能力建构”的转型，促进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高等教育职能使使命同向而行、协同共生。

关键词：高等教育；世界一流大学；人工智能治理；LDA 主题模型；社区发现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年第12期）

国际顶尖理工类高校本科教育模式比较——基于七所高校的案例分析 | 黄福涛

摘要：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选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东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清华大学为案例，系统分析全球顶尖理工类高校本科教育模式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欧洲大陆模式强调能力本位教育和结构化课程体系，美国模式突出研究导向、学生中心与创新驱动三者融合，日本模式采用本硕一贯制与“楔形”课程结构，中国模式则以国家战略为引领、科教融合和国际合作为核心。尽管各国顶尖理工类高校的本科教育体系因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不同而各具特色，但普遍呈现出研究导向、跨学科培养、实践创新和国际化拓展的共同趋势。未来中国理工类本科教育，应强化科研训练、优化课程体系、拓展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并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本土适应性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诚然，数据来源和案例选取的局限性是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关键词：本科教育模式；研究导向；创新人才培养；理工类高校；国际比较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5年第4期）

美国一流高校如何推进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行动与启示 | 王维军 段世飞

摘要：在全球知识生产方式转型背景下，博士生的学术职业社会化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该领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践路径。能力培养层面，学校通过讲座、研讨会、课程指导等途径，增强博士生对学术职业的认知，帮助其内化相关知识、技能与规范；关系网络层面，学校建构了校内外互动网络，为博士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提升博士生教学学术能力，并加深对学术职业的情感；组织支持层面，学校研究生院牵头统筹，多部门协同推进，注重尊重学科文化差异；为确保实践效果，学校通过四级评估体系对相关举措的实施成效进行全方位监督。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经验对当前博士教育改革与制度完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美国；一流高校；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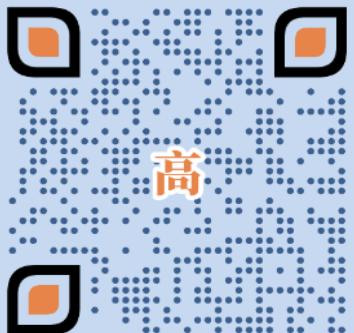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25年第11期)

地方高校教育博士培养如何特色化发展——基于美国两类研究型大学比较的视角 | 王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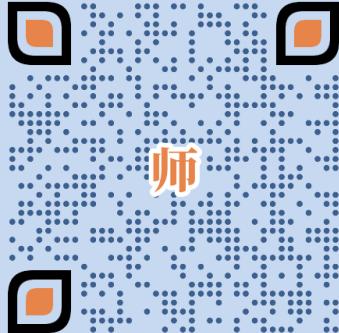
摘要：当前我国地方高校教育博士授权点数量已经超过部属高校。地方高校教育博士培养必须走出自身的特色化发展之路，否则可能出现与部属高校雷同，被视为部属高校教育博士“缩水版”的窘境。美国普通研究型大学在教育博士培养过程中历经了单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最初单纯的模仿虽然帮助普通研究型大学建构了初步的培养体系，但由于受软硬件条件限制以及无法与区域教育需求相衔接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低下；在痛定思痛后，普通研究型大学开始走上了特色化发展之路，通过主动契合地方教育发展需要、确立实践性人才培养定位、提高师资实践素养等赢得了社会认可和良好声誉。借鉴经验，我国地方高校教育博士培养应着力创建特色化发展之路，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主动贴近区域教育实际，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基础上，确立有别于部属高校的教育博士培养定位，明确为区域培养高端应用型教育人才的培养目标以及建立着力提升教育博士生实践理性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地方高校；教育博士；特色化发展；比较优势；实践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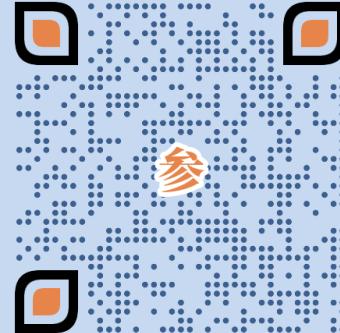
(来源：《现代教育论丛》2025年第3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6 年第 2 期
第 3 卷第 2 期·总第 44 期
2026 年 1 月 16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